

明清之際江南時事劇的發展及其 所反映的社會心態

巫仁恕

摘要

本文主要探討明末清初江南地區時事劇的發展及其所反映的社會心態。明代中期以後江南經濟的發達，造就了南方戲曲的蓬勃發展。至明清之際江南城市與農村經濟雖已衰退，但因未遭流寇之亂，離北方又遠，新聞傳播之訊息遲緩，使士大夫與富室未覺世局已岌岌可危，而依舊樂衷於演戲。而百姓則面臨空前之災荒與時疫，只得透過演戲的方式以祈神禳災，並藉此抒發心中的不安全感，祭祀演劇的盛行遂成爲普遍的現象，也使江南戲劇維持不墜。清軍南下時江南縱使有戰亂造成部份地區演劇短時間的中斷，然不久即恢復舊觀，故演劇之風仍持續，尤其是蘇州曲派的形成，造就了崑曲的另一高峰。明代中期以後興起以當代政治或人物爲題材的時事劇，到了明清之際仍有許多新的創作，主題環繞著晚明流寇之亂及南明弘光朝政事，清初還流行諷刺科場案之時事劇。直至順治朝晚期以後因爲清政府的高壓政策，終使得時事劇漸漸銷聲匿跡。最後以蘇州曲派的代表劇作家李玉爲例，透過對其兩本劇作的內容分析，探討明清之際的社會心態。從這兩齣劇本中反映了對忠臣與奸臣之辨、流寇的紛擾、地方官的貪污腐化、地方治安與變亂相繼出現（如奴變與寨堡）、政權交替時期百姓痛苦等諸面相的特殊態度與感受。

關鍵詞：時事劇 社會心態 明清之際 李玉

Drama in Jiangnan : It's Development and Reflection of Social Mentalities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Wu Jen-shu

Abstract

Nanxi originated in the Jiangnan area and developed amidst economic booming of the region during the late Ming period. Widespread peasant rebellions during the 1630s to 1640s had devastated many local economies. Jiangnan, however, was not much influenced by these events and *nanxi*-style plays continued to flourish in the region until early Qing. Many of the famous and popular plays written during this period were concerned with contemporary political and social events. From the final years of Emperor Congzhen's reign up until the Southern Ming government, the most popular plays were about peasant rebellions and the Southern Ming government. Not until the late Shunzhi Reign did this type of plays gradually disappear as a result of the government's high-handed policy to suppress the Han culture.

Among the playwrights in Jiangnan, Li Yu was the most prolific and well-known. This paper shows how his more famous plays reflect political and social events of his times, popular opinion, and the different mentalities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periods.

Key words: drama,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social mentality, Li Yu

明清之際江南時事劇的發展及其 所反映的社會心態

巫仁恕*

前言

- 一、明清之際江南的政局與戲劇
- 二、明清之際時事劇的興衰
- 三、明清之際的時事劇與社會心態——以李玉《兩鬚眉》與
《萬里圓》二劇為例
- 四、結論

前 言

清代史家趙翼(1727-1814)在《陔餘叢考》中的〈明人演戲多扮近事〉條講道：「明人演戲多有用本朝事者」¹，實則中國在明代以前已有將時事人物或故事作題材搬演成戲文的傳統，如宋元時期的王實甫、關漢卿等所著之《麗春堂》與《拜月亭》等，皆是前例。²但「時事戲」一詞則確實出現在明代，明人祁彪佳(1602-1645)在《遠山堂曲品》中即用此名，指涉以當代政治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¹ (清)趙翼，《陔餘叢考》(台北：世界書局，1990年)，卷 20〈明人演戲多扮近事〉條，頁 18b。

² 王實甫的《麗春堂》演金朝政治時事，戲中主角徒單克寧是「真人真事」，其上場白與《金史本傳》所載幾乎若合符節。關漢卿的《拜月亭》以 1214 年蒙古兵圍攻北京，金人遷都為背景。

時事或政治人物為題材之劇本。這類戲曲在明代後期大量出現，而且一直持續到清初，此現象在歷史上是空前的。

過去有關明末清初時事劇的研究，大多是大陸學者所作的介紹性文章，主要敘述時事劇興起的時間與原因，並大致介紹類型與隨後之發展。³對個別劇本作較專門的探討者，焦點主要多集中在《鳴鳳記》以及李玉所著的《清忠譜》與《一捧雪》三齣劇本，這三本劇作的內容是述及明末嘉靖與天啓年間的時事。而明清之際也創作了相當多的時事劇，至今仍可見者諸如《萬里圓》、《兩鬚眉》、《合劍記》等，但是相關之研究則相對地少得可憐，⁴本稿乃嘗試探討此時期的時事劇。

之所以選擇明清之際的時事劇作探討，還牽涉到兩個原因，第一是明清之際是時事劇興衰的關鍵時期，其興衰的原因是值得探討的問題；其次，明清易代乃當時政治之一大變局，人民處於朝代更替的世變之際，對世局與政治人物的看法，透過時事劇正可以反映出來這些心態。⁵又明末清初的時事劇之出版與流行，大多集中在江南地區，所以本文的討論在地域上也集中於

³ 這類著作如王永健，〈中國古代的時事劇〉，《光明日報》（1979年12月12日）；戴不凡，〈漫談戲曲史上的「時事劇」〉，《戴不凡戲曲研究論文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110-122；徐扶明，〈明末清初時期的時事劇〉，《元明清戲曲探索》（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頁237-245；郭英德，〈明清時事劇概述〉，《江蘇戲劇》，期2（1985年）；顧篤璜，〈昆劇史補論〉（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64-66；郭英德，〈明清文人傳奇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三章與第五章；郭英德，〈明清之際時事劇的藝術特色〉，《中州學刊》，期2（1985年），頁79-87。

⁴ 僅見徐銘延，〈李玉《兩鬚眉》本事考〉，《徐銘延文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頁36-48；徐扶明，〈《萬里圓》的時代特色〉，《元明清戲曲探索》，頁192-199。

⁵ 關於「心態」(mentalite)一詞，雖是近年來法國與歐美史學經常談論的主題之一，但也是定義模糊的名詞；根據法國年鑑學派史家 Le Goff 的解釋，是凡夫俗子對世界的想像，一個既典型又混亂的心態。參見梁其姿，〈心態歷史〉，《史學評論》，期7（1984年），頁75。姚蒙在《法國當代史學主流—從年鑑學派到新史學》（台北：遠流出版社，1988年）一書中的界定是：「心態」是一定時代社會、文化心理和觀念及其反映的總稱。心態構成了特定社會的價值—信仰—行動體系，這一體系常以集體無意識的形式積澱在特定的文化中，並構成這一文化的最基本層次。（頁192）

此。⁶

本文在第一節中討論明清之際江南戲劇的發展。江南的戲曲發展至明清之際時，雖面臨政局的不安與世變，但戲曲的發展不但未因之中衰，反而持續盛行，其原因頗值得探究。又此時期持續出現了許多時事劇，惟至順治末年之後，創作似乎停止，其過程與原因將在第二節中加以討論。第三節以明清之際名劇作家李玉的兩部時事劇《兩鬚眉》與《萬里圓》為例，透過將劇本內容與史實之間的差異作比較分析，尤其把重點放在其中對政局的描寫以及政治人物的形象塑造上，以說明劇本中所反映出當時人民的社會心態。

一、明清之際江南的政局與戲劇

（一）明季江南演劇仍盛

明代自嘉靖以後江南地區商品經濟與城市經濟的發達，造就了一個物質豐裕的社會，奢侈之風應之而生，而娛樂文化也因為有消費的群眾而特別發達。因之演戲之風氣大盛，同時也促使南方的戲曲特別發達。⁷

迨至明季江南城市呈現經濟萎縮的情況，商業蕭條成了明季城鎮的特點之一。如嘉定縣的外岡鎮在神宗初年時，「四方之巨賈富駟，貿易花布者皆集于此，遂稱雄鎮焉。」但至崇禎時，「公私交迫，詐偽蒙生，挾資相戒不前，而民生日促，殆不可為鎮矣。」⁸更糟的是崇禎年間江南遭遇空前的天災，其間包括有旱災、蝗災、疾疫與饑荒等等⁹（參見附表一中蘇、松二府之

⁶ 所謂的「江南」在明清有兩重的定義，一是行政區劃，即指明代的南直隸與清初的江南省，即今之江蘇與安徽省，包括的地域尚有長江以北之府州；一是指地理上的稱呼，主要是上面行政區劃中長江以南的蘇州、松江、常州三府，而浙北的杭州、嘉興、湖州三府亦常與前三府列名江南諸府。本文所述之「江南地區」採取較廣義的定義，即包括行政區劃的江南，以及浙北三府。

⁷ 有關明代中期以後南方戲曲之發展與當時社會經濟發展之關係，筆者將另撰文詳細討論。

⁸ 崇禎《外岡志》（據1961年鉛印《上海史料叢編》本影印），卷1〈沿革〉，頁4。

⁹ 據Dunstan的研究，明代後期江南的災荒與疾疫主要集中在1580年代後期與1640年代前中期，從其統計中顯示後者在規模與時間上恐要比前者更大更久。參見Helen Dunstan, "The Late Ming Epidemics: A Preliminary Survey" in *Ch'ing-shih wen-t'i*, Vol.3, No.3(1975),

例)，農村的農民生活日益貧困，農產量直線下降，造成糧食與物資的短缺，再加上商路受阻，使得當地物價上漲，百貨騰貴（參見附表二）。清人葉夢珠的《閱世編》就指出崇禎十五年(1642)時松江府經濟衰退的情形：

蓋松民質利，半仰給於織紡。其如山左荒亂，中州糜爛，尤甚吾鄉，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布商裹足不至，松民惟有立而待斃耳。加以軍興餉急，欠漕米一石，時須價銀五兩有奇。本邑無米，乞糴他境，莫不破家。¹⁰

許多原來是手工業的大城鎮，也都因此而衰弱，而原來以此維生的城鎮人口失業率也大增。葉氏書中就說崇禎十四年(1641)時松江府因旱災與蝗災而大饑，至次年時「白米價五兩，豆麥稍差，糟糠秕稈，價亦驟貴。」正因如此，所以當地僱募工人的薪資，「惟求一飽，不問牟麥，世風爲之一變。」¹¹但是在某些大中城市內，由於官僚、士大夫與富戶的持續增加，使得某些服務業如茶樓酒館、鬥雞走狗、擊筑歌舞等娛樂場所仍舊興旺，尚維持明代中葉以來的虛假繁榮，¹²而演劇就是其中之一。

雖然經濟蕭條，但是江南戲劇的發展至明季仍舊依然興盛，其原因正如同吳江人鈕琇所言：

明崇禎末，流氛日炙，秦豫之間，關城失守，燕都震動，而大江以南，阻於天塹，民物晏如，方極聲色之娛，吳門尤盛。¹³

江南因爲未受兵害，再加上新聞傳播較慢至該地，所以江南地區的人們一直都未意識到明政府已岌岌可危。明朝最後的兩年—崇禎十六(1643)、十七年(1644)間，江南演戲之風不衰反盛，如王杓(1628-1692)在其自撰之《王巢松

pp.1-59.另邱仲麟，〈明代的疫厲—兼及官民的肆應〉，第一屆兩岸明史學術研討會論文，1996年。

¹⁰ (清)葉夢珠，《閱世編》（台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卷1〈災祥〉，頁14。

¹¹ 同上書，頁14。

¹² 有關明季城市與鄉村經濟衰敗的一般情形，參見李龍潛，《明清經濟史》（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88年），頁273-276；傅衣凌，《明史新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419-422。

¹³ (清)鈕琇，《觚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卷4，陳圓圓條，頁69。

年譜》記崇禎十六年時，「（太倉）州中元宵最盛，大人致郡優演劇，見《炳靈公》一齣，觀者無不叫絕。」¹⁴直到崇禎十七年(1644)三月中旬，李自成進入北京，崇禎自縊於煤山後，仍可以看到江南地區的人們仍熱衷於戲劇的情景。如葉紹袁(1589-1648)在《啓禎記聞錄》中記崇禎十七年時事歎道：「四月初二日，吳江賽會，目睹者云：『富麗異常，為郡中從來所未有。』是時北都不祥之說已競傳，民間猶為此舉，可見人無憂國之心。」¹⁵不只是小老百姓如此，有些官宦也是如此。崑山人歸莊(1613-1673)當時有〈聞北信〉詩一首，後注中指出：「四月晦日，糧儲運署中演戲；五月朔至端午，嘉定知縣日挾妖童娼妓觀龍舟。」¹⁶

概因當時新聞傳播之速度有限，從北方傳至南方的消息，透過邸報、塘報、北來單與各種小報傳播，大約都需要一個月以上。北京陷落的消息在南京官僚之間較早知悉，約在四月中旬。而江南其它地方則要到四月下旬至五月初才得知消息。傳到其它的地區則更久，如福建地區知道此事都已是五月下旬。¹⁷就以常州府無錫縣的狀況為例，清人計六奇的《明季南略》一書中有親身經歷的體驗如下：

四月廿七日，予在舅氏看梨園，忽聞河間、大名、真定等處相繼告陷，北都危急，猶未知陷也，舅氏乃罷宴。廿八日，予下鄉，鄉間亂信洶洶。廿九日下午，君徵叔云：「崇禎皇帝已縊死煤山矣。」予大驚異。¹⁸

上引常州府收到北京陷落的消息時，已是四月底。而在江南第一大城蘇州府

¹⁴ (清)王抃，《王巢松年譜》，收在《叢書集成續編》第37冊（上海：上海書店，1994），頁793。

¹⁵ (明)葉紹袁，《啓禎記聞錄》，卷3，頁8a。

¹⁶ (明)歸莊，《歸莊集》（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卷1〈詩詞〉，聞北信續聞，頁31。

¹⁷ 參看岸本美緒，〈崇禎一七年的江南と北京情報〉，《和田博德教授古稀紀念・明清時代の法と社會》（東京：汲古書院，1993年）。

¹⁸ (清)計六奇，《明季南略》（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卷1，南京諸臣議立福藩·附記，頁7。

的情形，則如蘇州人鄭敷教(1596-1675)之年譜中記載：於四月初，「途遇張玉筍中丞，始聞三月十九日之信；五月朔傳確報。」¹⁹太倉州知道的時間更晚，如《王巢松年譜》記崇禎十七年時，「三月中忽遭國變，吾鄉在五月初，方知確音，天崩地裂。」²⁰

另外，明清之際江南經濟正值衰退期，但民間迎神賽會的演戲風氣較過去更盛，如《啓禎記聞錄》中記崇禎十六年七月間，蘇州楓橋一地有好事者斂銀於糧食行，作為迎神賽會與演戲之資；其間演戲之風使「衿紳士庶，男女老幼，傾城罷市，肩輿舟楫之價，皆倍於常，通國若狂，殊為可怪。」²¹康熙《松江府志》也描寫崇禎十三年(1640)時，「當春月，偏處架木為台演劇，名曰：神戲。」即使是「向極嚴肅」的府城隍廟，於崇禎末年時，「忽于十二門起樓北向演劇賽神，小民聚觀，南向而坐，殿庭皆滿。」²²至於戲班與優伶在待遇與酬勞方面，從前正德嘉靖年間每日酬勞不過是銀五錢左右，²³但隨著江南奢侈的風氣高漲，至崇禎初年時即使是一般社戲的場合，索費亦有一日近「三、四十金」者。²⁴到了明季災荒連年的時節，卻仍然居高不下，據《識小錄》記載：

吳中幾十年來，外觀甚美，而中實枵然。至近年辛巳（崇禎十四年）奇荒之後，即外觀亦不美矣。而優人鮮衣美食，橫行里中，人家作戲一本，費至十餘金，而諸優猶恨嫌少，甚至有乘馬者、乘輿者、在戲房索人參湯者種種惡狀。²⁵

¹⁹ (清)徐雲祥、沈明揚等編，《鄭桐菴年譜》，收在《甲戌叢編》（台北：世界書局，1976年），卷上，頁7a。

²⁰ (清)王抃，《王巢松年譜》，頁793。

²¹ (明)葉紹袁，《啓禎記聞錄》，收在《痛史》第5冊（台北：廣文書局，1968年），卷3，頁5a-b。

²² 康熙《松江府志》（清康熙二年[1663]刊本），卷54〈遺事下〉，頁21a-b。

²³ (明)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卷13〈史九〉，頁109。

²⁴ (明)葉紹袁，《葉天寥年譜別記》，收在《年譜十種》（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壬申五月條，頁18a-b。

²⁵ (明)徐樹丕，《識小錄》，收入《筆記小說大觀》40編3冊（台北：新興書局據國立中央圖書館藏佛蘭草堂手鈔本影印，1990年），卷4，吳優條，頁534-535。若與華北來比較

如此現象已非全是經濟因素所使然。葉紹袁對蘇州當時的情景有一段類似人類學式的觀察：

（崇禎）十四、十五兩歲，吳民之斃於餓者、疾疫者，難以數計矣。不意十六、十七年冬春之交，疫癘又大行，且朝發夕斃，大抵城外尤盛，南濠醃魚行櫛比而列，免者殆少，甚至一家有斃十餘人者。人心惶懼，設醮理懺祈保，猶為近理，乃市井不肖，乘此強斂民財，以唱戲媚神，就中侵漁自肥，殊可痛惡。一時此風大熾，城內外戲台相望，多至生事。²⁶

他在崇禎十六年(1643)時也發現到蘇州因為過五月不雨，田不能蒔，致米價日騰，所以「民間迎神賽會者晝夜不絕，因以請雨為名」；同樣地，徐樹丕的《識小錄》也記在崇禎十七年(1644)間，北京流行的「疙瘩瘟」（又名「西瓜瘟」）可能隨著北方人民避難南方而傳到江南，並描繪在蘇州肆虐的情景：「其人吐血一口，如西瓜狀，立刻死。」於是「一時巫風遍郡，日夜歌舞祀神，優人做戲一本，費錢四十千。」²⁷《埋憂集》也記蘇州百姓「相率祈鬼神，各家設香案，燃天燈，演劇賽會，窮極瑰奇。」²⁸看來這些演劇功能並不只是純娛樂，而是為了祈神禳災。其實這種迎神賽會的演劇，是在中國民間宗教信仰下的祭祀場合所誕生的。在許多廟宇的祭祀場合底下，所演的戲劇劇目如「關公戲」、「目連戲」等，和其他除煞驅邪的「儺戲」的性質相似，其演出本身往往就是一種逐疫禳鬼，祛邪除祟的宗教儀式。²⁹明

地域性的差異會發現，江南優伶的身價要比華北高。如描寫明代萬曆年間山東清河縣為背景的《金瓶梅詞話》，在四十三、六十、七十八回都記有戲價與賞銀的數字，大約都在一到四兩之間，較之記江南地區的《四友齋叢說》與《識小錄》二書中的戲價，華北是要少得多。

²⁶ (明)葉紹袁，《啓禎記聞錄》，卷3，頁6a。

²⁷ (清)徐樹丕，《識小錄》，卷4，甲申奇疫條，頁533-534。有學者認為疙瘩瘟是腺鼠疫，而西瓜瘟是敗血性鼠疫。參見馬伯英，《中國醫學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頁593-595。

²⁸ (清)朱梅叔，《埋憂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卷3，疫異條，頁7b。

²⁹ 有關祭祀演劇與儀式進行實為一事兩面的觀念，即所謂「祭中有戲，戲中有祭」之說，參見周胎白，《湘劇漫談》，《中國戲曲論集》（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60年），頁249-325；龍彼得著，王秋桂、蘇文貞譯，《中國戲劇源於宗教儀典考》，《中外文學》7

季江南雖未受流寇兵災之苦，但是災荒與疾疫卻連年不斷，在附表一中也可以看到這種情況至崇禎末年更是嚴重。因之明季江南民間盛行演劇的風氣，實乃為祈神禳災而形成的。演劇的興盛不但不是江南經濟繁榮的寫照，反而是反映出江南人民心中的不安全感。

（二）清初江南政局對演戲的影響

至明朝首都淪陷，許多北方大家與士大夫南渡僑寓於南京，使得江南聲色犬馬不減。如吳偉業(1609-1671)形容道：「當是時江左全盛，舒桐淮楚衣冠人士，避寇南渡，僑寓大航者且萬家。秦淮燈火不絕，歌舞之聲相聞。」³⁰有的士大夫避難南方時，還不忘要帶著自己的家班。如祁彪佳之兄祁豸佳，字止祥，好音律，在《祁忠敏公日記》中記載了不少止祥家班演戲活動：

（順治二年）六月初一日，……薄暮抵寓山，知止祥兄已從南都避難歸，亟至舊宅晤之。止祥兄尚有歌者攜歸，時文載弟留酌，遂欲演戲，予力阻而罷。³¹

祁豸祥於山河變色逃亡之際，卻仍舊依戀優伶演戲，無怪乎祁彪佳同當時其他的士大夫皆有同感地歎道：「國難未紓，居然忘變，人心亡盡，豈止賈太傅之哭也哉！」³²

北京淪陷後，江南各地曾發生許多小騷動，如燒打「從逆」紳家與奴變等。該年五月福王在南京即位為弘光帝，局勢才穩定下來，但隨後清軍也開始進兵江南。次年，即順治二年(1645)四月清軍攻破揚州，五月清軍進入南京，弘光遁逃，明忻城伯趙之龍(?-1654)與禮部尚書錢謙益(1582-1644)等迎

卷 12 期(1979)，頁 158-81；田仲一成，《中國祭祀演劇研究》（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81 年）。

³⁰ (清)吳偉業，《梅村家藏稿》（上海涵芬樓景印董氏新刊本），卷 28，宋子建詩序，頁 11a。

³¹ (明)祁彪佳，《乙酉日曆》，收在《祁彪佳文稿》（北京：書目文獻，1991 年），頁 1440。

³² 同上。

降。此際江南各地又開始有許多明官兵、鄉兵與義軍，到處打糧為亂或興起奴變。六月，清軍取無錫，下蘇州。十三日清軍至杭州，明潞王率眾開門迎降。但是接著清軍嚴令軍民薙髮，因而在閏六月間引起各地大規模的抗清運動。其中較重要且規模較大者如下：閏六月有漁民張三及明職方主事吳易等據太湖，駐宜興反清，後圖蘇州失敗。七月發生「嘉定三屠」事件。八月江陰人民抗清起義失敗；同時陳子龍(1608-1647)等據松江府抗清亦告失敗。九月間明魯王軍攻杭州兵敗；金聲(?-1645)起兵徽州抗清失敗。之後的兩年仍有抗清事件發生，如順治三年(1646)九月，江南溧陽、金壇二縣義軍密謀攻南京，事發失敗。順治四年(1647)五月，陳子龍策動松江兵變反清，後仍歸失敗。至此，江南大勢抵定。³³

順治年間江南屢見兵燹，部份城市與地區的劇班紛紛解散或歇業，例如南京在清軍入城之後，原來避居於此的巨室富戶，以及商賈、士人等紛紛逃散，造成一片淒涼景象。余懷之子余賓碩(?-1722)在《金陵覽古》中說當地原是「家家竟為幽潔曲廊便房，迷不可出，教諸小鬟學梨園子弟以娛客，每至暮夜，燈火競輝，眾香發越，羯鼓琵琶聲，與金縷紅牙聲相間，入其中者無不人人自失。」但是到清初以後的情形則是：「鼎革後，數年之間，風流雲散，勝事煙消，舞榭歌台，鞠為茂草矣。」³⁴桐城人方文(1612-1669)在《翁山集》中也曾提及崇禎初年時，他到南京應試，「南都風景居然全盛也。」至順治十五年(1658)冬重遊該地時，「城郭人民大抵如舊，惟蔣山、雀湖等處，非復當年矣。」³⁵這種現象直到康熙初年才有轉變。又如江南另一大城杭州，雖然潞王降清使杭州沒遭到太大的破壞，但是昔日繁榮景象已

³³ 有關此時期江南抗清之梗概，參見魏斐德(Wakeman)著、陳蘇鎮等譯，《洪業—清朝開國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八章，頁556-559、594-634；第十章，頁668-730。

³⁴ (清)余賓碩，《金陵覽古》（上海：上海古籍書店據康熙年間刻本影印，1983年），卷3，頁33a-b。

³⁵ (清)方文，《翁山集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本影印，1979年），《徐杭遊草》，頁24a。

不再。³⁶據毛際可(1633-1708)在《春星堂詩集》中記其少年時遊杭州，時值明季承平之餘，故「六橋花柳映帶如畫」，「樓觀亭榭復爾鱗次櫛比」，「每四方名流至此，必選伎徵歌，連宵達旦。」至清初當他入杭州赴試時的景象，則是「當鋒火甫靜，橋蘇蹂躪，林盡山童，西冷南屏之境游人絕跡，幾嘆此生不復見湖山之盛。」據他的說法是之後三十餘年才「稍復舊觀」。³⁷這兩地原有許多著名的家班，都因戰亂而散入職業戲班，如著名的阮大鍼(1587-1646)家班，在阮氏死後也「散于他室」；而職業戲班也多有轉移至別地者。

同時我們還可以看到另外一些城市與地區，則因受到的兵燹影響較小，所以演戲的風氣很快就恢復了。例如蘇州雖有少許的抗清運動，但很快地就穩定下來，所以順治三年(1646)元旦，官廳就有搭台演戲之舉：

撫院大廳曹虎，於望前搭台關帝城隍二廟，喚上等梨園二班，各演戲七日以款神，士民統觀。³⁸

至於一般農村百姓迎神賽會所演的社戲，在蘇州也是四時不絕，繁榮依舊。如《逸史殘鈔》所記順治六年(1649)的情形：

沿河村落中，當茲春日，必有巡神演戲之事……時河濱有村，曰張王墩者，連日演戲，男女逕而至者，大半艤舟河曲，密如戰艦，甚盛會也。³⁹

明季詩人顧偉有〈江城秋燈篇〉一詩，形容明末以來吳中燈市的盛況，到了清初，「誰知鞭鼓揭天來，人去城空事可哀」；但是城市蕭條的情形持續的並不久，故謂：「淒涼亦止十餘年，江上繁華轉勝初」，「土穀靈祠高樹幟，建作勾欄呈百戲。」⁴⁰

³⁶ 有關清初南京與杭州劇團的衰弱，參看胡忌、劉致中著，《昆劇發展史》（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9年），頁258-265。

³⁷ (明)汪汝謙著、(清)汪師韓輯，《春星堂詩集》（光緒十二年[1886]汪氏長沙刊本），卷5〈遺稿·序〉，頁1a。

³⁸ (清)葉紹袁，《啓禎記聞錄》，卷6，頁9a。

³⁹ 原書未見，轉引自《昆劇發展史》，頁266-67。

⁴⁰ 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明遺民卷)》（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頁1204。

至於士大夫方面也漸漸回到明末的老路，有的繼續創作劇本，有的畜養起家班演戲，最佳的例子就是蘇州府長洲縣人尤侗(1618-1704)，在其年譜中自述順治十三年(1656)時，「先君雅好樂伎，予教小伶數人，資以裝飾，登場供奉，自演新劇曰：『鈞天樂』。」⁴¹結果因為此劇險些釀成牢獄之災。松江府的情況與蘇州頗類似，至清初演戲的風氣仍舊，如上海人李雯(1607-1647)於順治二年仕清為中書舍人，召友集於小軒觀《吳越春秋》傳奇，同座龔鼎孳(1615-1673)乃作詩以記。⁴²又如余懷在其所著《三吳遊覽志》中，記載順治七年(1650)間他遊歷至松江華亭時，觀名伶楚雲演《拜月亭》劇；又與訪友「置酒觴予，演《兩世姻緣》，喧闐徹夜。」⁴³其他地方如鎮江府金壇，順治六年(1649)該地名人虞來初七十壽，其子虞巍乃為之鋪張壽宴，並請吳江劇作家沈自晉(1583-1665)撰《耆英會》傳奇上演。⁴⁴

清初在江南某些盛行演戲的地區，優人演戲酬勞之高依舊，較明末毫不遜色。清初蘇州府吳江人陸文衡在順治年間出版的《鬻菴隨筆》中記道：

蘇州素無蓄積，而習於侈靡。近為兵寇賦役所困，貧極矣，而侈靡愈甚。……萬曆年間，優人演戲一齣，止一兩零八分；漸加至三四兩、五六兩。今選上班價至十二兩。若插入女優幾人，則有纏頭之費，供給必羅水陸，此妄耗者也。⁴⁵

此外，葉紹袁的《甲行日注》也可作為旁證。據該書記載順治五年(1648)二月，「十一日丙子，……平湖郊外盛作神戲，戲錢十二兩一本。」⁴⁶由以上二則史料看來，當地演戲一齣十二兩的戲錢應不致太離譜。若將以上有關演

⁴¹ (清)尤侗，《年譜圖錄》（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刊本），頁 8a。

⁴² (清)龔鼎孳，《定山堂詩集》（光緒九年[1881]功硯緒重刊本），卷 17，頁 1a-b。

⁴³ (清)余懷，《三吳遊覽志》，收在《筆記小說大觀》23 編 3 冊（台北：新興書局，1978 年），頁 3b，4b。

⁴⁴ (清)《鞠通樂府》，引自張慧劍，《明清江蘇文人年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頁 633。

⁴⁵ (清)陸文衡，《鬻菴隨筆》（台北：廣文書局，1969 年），卷 4，頁 13b-14a。

⁴⁶ (明)葉紹袁，《甲行日注》，收在《筆記小說大觀》4 編 7 冊（台北：新興書局，1989 年），卷 7，頁 2a。

戲價碼與當時物價相比較，當可約略看出優伶戲子的待遇。附表二是以蘇州府為例，將明萬曆至順治初年的米價、田價與演戲價碼作一比較。由此表中可以看到，明末清初江南的米價與田地價格，尤其是在明清之際的崇禎末年與順治初年，因為天災而不斷地高漲。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江南戲子優伶的價格，幾乎與米價、田價一樣地呈現上漲的趨勢。據學者研究，明清鼎革之際，某些商品如棉布與棉花的價格皆有呈下跌之趨勢，相對而言，戲子優伶的價碼則是相對地穩定成長。若再與當時工人工資來比較，根據黃冕堂的估計，明代承平時農村長工工資是每年工銀三兩，日工的價格方面，農村以日銀三分折錢二十餘文為常價，城市以日銀四分折錢三十文為常價。⁴⁷那麼到明季一個戲班搬演一齣戲的酬勞，是長工三年到四年的工資，是農村日工十一個月至十三個月的工資，是城市日工八到十個月的工資。事實上就如前葉夢珠所述，明季工人待遇已是「惟求一飽」而已。由此可見優伶戲子處之世變，待遇仍然優厚。以上這些例子說明在清初江南某些地方，戲劇仍然流行的情景。

綜而言之，明季江南的戲劇仍舊發達，一方面因為江南未受流寇之擾，又因新聞傳播訊息較晚，江南不知首都北京岌岌可危；另一方面，災荒時疫不斷，一般百姓心中充滿著不安全感，只得藉由演戲以祈神禳災。所以無論士大夫的宴客演戲，或是民間的迎神賽會演戲，都仍然持續流行。至清初江南雖歷經兵燹，使部份地區的演戲風氣中衰，但仍然有部份地區因為所受之影響較小，演戲之風依舊興盛，蘇州即為一代表。所以在明清之際形成了以李玉為中心的蘇州曲派，將崑曲的發展帶入另一個高峰。

二、明清之際時事劇的興衰

（一）明清之際盛行的時事劇類型

明代中期以後撰寫時事以入戲文蔚為風潮，明季延續明代後期以來的傳

⁴⁷黃冕堂，〈明代物價考略〉，《明史管見》（濟南：齊魯書社，1985年），頁368-370。

統，再加上時局動蕩不安，此時仍然產生了相當多的時事劇創作，而江南地區是時事劇刊刻與流行的大本營。⁴⁸大致上此時期的創作可以分為兩大題材：一是描寫明清之際抵抗流寇的英雄傳奇，另一種是涉及南明政權興衰的時事劇。

第一類題材的劇作中主角，往往是明朝的地方官。例如《蜀鵑啼》中的吳志衍、《合劍記》中的彭士弘、《錦江沙》的趙嘉煒、以及下節將討論的《兩鬚眉》中的主角黃禹金與鄧氏等皆是。

《蜀鵑啼》傳奇為常熟人丘園(1617-1690)所著。《蜀鵑啼》的內容係表彰一位死於頑抗流寇的明朝地方縣官，並於順治三年(1647)演出。⁴⁹據吳偉業〈觀蜀鵑啼劇詩序〉云：「《蜀鵑啼》者，丘子嶼雪為吾兄成都令志衍作也。」丘園，字嶼雪；吳偉業其兄吳繼善，字志衍，崇禎十年(1637)進士，受命官成都知縣。當時荊襄已陷，張獻忠攻蜀，繼善曾啓蜀王發帑金為備禦流寇計，而藩府金繪積者數百萬，蜀王卻不答應，最終為張獻忠攻陷，繼善也為獻忠所殺。以其在蜀被難，故曰「蜀鵑啼」也。⁵⁰《海虞詩苑》中形容丘園所著的《蜀鵑啼》與《黨人碑》等劇，「至今流傳遍江左。」由此可知該劇流行的程度。⁵¹

《合劍記》作者為河北真定生員劉鍵邦（生平無考），此劇是當時創作的時事劇中少數非江南人所著的劇本。全劇記崇禎時河北真定府南宮縣知縣彭士弘殉節事。崇禎末流寇劉方亮攻城，彭被執不屈，以身殉難。當時劉鍵邦目擊其事，遂為此作記。⁵²

⁴⁸ 據林鶴宜的研究指出，晚明時期戲曲刊刻的主要據點包括了浙江的杭州、紹興、吳興（湖州府城），江蘇的南京、蘇州、安徽的歙縣（徽州府城）、及福建的建陽。幾乎全都集中在江南地區。見氏著，《晚明戲曲劇種及聲腔研究》（台北：學海出版社，1994年），頁86。

⁴⁹ 馬導源編，《吳梅村年譜》（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頁49。

⁵⁰ (清)黃文暘，《曲海總目提要》，卷20，頁908-910。但據《研堂見聞雜記》，收入《痛史》第10冊（台北：廣文書局，1968年），則稱張獻忠入蜀後，吳志衍勉強為官，授為吏部尚書，後終為獻忠所誅。見該書頁13a。

⁵¹ (清)王應奎編，《海虞詩苑》（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王氏家刊本），卷5，頁24a-b。

⁵² (清)黃文暘，《曲海總目提要》，卷11，頁501-503；莊一拂，《古典戲曲存目彙考》

《錦江沙》的作者據《曲海總目提要》記載為會稽人蔡東所撰。該劇係演明末四川成都府郫縣知縣趙嘉煒(1597-1644)因張獻忠急攻成都，受令堅築堤堰，蓄錦江之水以護城池，然該縣終為流寇所破，嘉煒也為賊所獲，逼降不從，慷慨罵賊，投水殉節。其子趙慶麟則萬里尋親，負江沙歸葬，故曰「錦江沙」。⁵³若比對吳偉業之《綏寇紀略》，可知該劇多係史事，只是作者所知未如吳氏之詳，因而緣飾較多。

以上這幾本劇作都是與史實相當接近者，另外還有一些內容與史實出入相當大的時事劇，例如吳縣朱葵心所撰之《回春記》，該劇作於崇禎十七年(1644)，演明季崑山人湯去山與友人諸文止，游西湖時與山陰人高士斌相識後，暢論邊庭時事。後湯、諸二人中試入第，而北都陷，福王立於南京，高士斌起為大將軍，用湯為行軍參謀，奪北京、征陝西，大敗李自成。湯升官後盡誅貪官污吏，功成歸隱。此全係作者之理想而已，只有李邦華於北京城破自縊一折，乃屬史實。⁵⁴又如不知撰者姓名的《鐵冠圖》一劇，黃文暘在《曲海總目提要》中批評道：《鐵冠圖》影掠崇禎事跡，尤其是李自成陷北京後諸臣史事，但是「真偽錯雜，淆惑視聽。」「閱者每信為實，不知當時妄傳甚多，偶信一說而筆之書，久而事實漸明，其誤自見也。」⁵⁵。即使如此，但在當時依然盛行，據方文於順治十五年(1658)遊南京時，有〈湖上觀劇詩〉一首，形容《鐵冠圖》一劇在清初江南流行的情況：「誰譜新詞忌諱無，優伶傳播到西湖；驚心最是張方伯，不敢重看《鐵冠圖》。」⁵⁶至於李玉的《武當山》一劇演涉楊嗣昌、秦良玉與張獻忠事。但劇中描寫楊嗣昌等人圍誅張獻忠於武當山下，則與史實出入頗大，因張獻忠並非死於武當山，亦非楊嗣昌兵所誅，張獻忠死時楊嗣昌已歿久矣。⁵⁷此劇今已佚失，無法窺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頁1060。

⁵³ (清)黃文暘，《曲海總目提要》，卷25，頁1101-1102。

⁵⁴ 莊一拂，《古典戲曲存目彙考》，頁946。又見李修生編，《古本戲曲劇目提要》(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7年)，頁327。

⁵⁵ (清)黃文暘，《曲海總目提要》，卷33，頁1459a、1469。

⁵⁶ (清)方文，《僕山集續集》之《徐杭遊草》，頁26a。

⁵⁷ (清)黃文暘，《曲海總目提要》，卷27，頁5a-b。

其全貌。

在第二類批評與諷刺南明政權的劇本中，又以諷刺阮大鍼為主題的最多，如順治四年(1647)有常州府無錫縣人三餘子，以阮大鍼僵死仙霞嶺事創作《仙霞嶺》雜劇，痛加誅斥。據顧憲成(1550-1612)之孫顧樞的〈仙霞嶺討賊歌序〉云：

《仙霞雜劇》友人三餘子為周、雷二公及阮賊大鍼作也。生面重開，熱腸如寫，澆予塊壘多矣，歌以志之。⁵⁸

因為關於阮大鍼之死，有一說法是指其降清後，從清軍入閩攻仙霞嶺，於途中仆死石上，故該劇以此為名。⁵⁹

同年常州府武進縣人董以寧(1629-1670)至安徽當塗時，見其地上演阮大鍼背明故事劇，遂撰有〈采石磯讌集記〉一文云：

順治丁亥春，董生客遊姑孰，讀書采石磯之念北樓。時四方人士畢集，置酒高會，董生以江南年少居末坐，命梨園演皖人近事，時江淨如練小舟皆泊磯下。……曲將終，前席者大言曰：「此地非常開平先登處乎？誰使之竟為軹道也！」有客厲聲曰：「今所演皖人者是耶。」復有客曰：「此皖人之罪，罪固不止皖人。」各傾一斗酒，酒立盡。⁶⁰

據此文中又記該齣戲上演時有一些不速之客，如有一丈夫偕無鬚男子、有虬髯老僧、又有八、九人佩長劍面蒼黑者等，紛至觀戲，可見此戲吸引了不少一般平民觀眾，而引發眾人之共鳴。其中皖人是指阮大鍼，因其為安徽桐城人，故當時人多稱阮大鍼為「皖髯」或「皖人」。而常開平是指常延齡，為

⁵⁸ (清)顧光旭編，《梁溪詩鈔》(宣統三年[1911]重刊本)，卷12，頁5a。

⁵⁹ (清)錢秉鐙，《藏山閣文存》，收在《台灣文獻叢刊》第225種(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6年)，〈雜文〉，皖髯事實條，頁75；又關於阮大鍼之死因有許多種不同的說法，一說是降清後畏罪自投崖下死，一說是從攻仙霞嶺時氣絕，或謂其於嶺上時自矜得意，為士卒擠之墜岩死。參見(清)徐燾，《小腆紀傳》(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77年)，卷62〈姦臣〉，頁709。

⁶⁰ (清)董以寧，《正誼堂文集》，收入《國朝文會》(乾隆年間平河趙氏清稿本)，頁23a-b。

開平王常遇春(1330-1369)之十二世孫也。崇禎時曾疏陳時政，凡十二上，帝嘉納之；迨南都之起用阮大鍼時，他與廷臣交章劾之，不報，遂掛冠去。在弘光朝亡國後，他與妻氏歸隱南京，歿無以殮，友人醵金葬於雨花台側，而非采石磯。⁶¹儘管如此，從上面的引文中說：「此皖人之罪，罪固不止皖人。」一語，實反映了江南人們對阮大鍼的痛恨，及對弘光帝的不滿。而此時距弘光朝亡國亦不過相隔兩年。

直到順治末年康熙初年，這類以南明政治為主題的時事劇仍然很風行，例如順治十三年(1656)山陽丘象隨泊舟寶應時，還可看見岸上梨園正上演崇禎十七年(1644)甲申朝時事劇。⁶²康熙五年(1669)，安徽廬江仍有上演史可法勤王故事劇，沛縣人閻爾梅(1603-79)觀後作紀事詩云：「元戎親帥五諸侯，不肯西征據上游；今夜廬州燈下見，還疑公未死揚州。」⁶³因為閻氏於順治二年時曾投入史可法幕下，力勸史可法據留徐州，然終不果而離開史幕下，遂引以為憾。⁶⁴

可惜的是這類時事劇至今留存下來者，或可知劇目名稱者，非常稀少，因之我們無法窺其全貌，下節所討論的《萬里圓》是少數至今仍可見者。

（二）清初時事劇的衰微

至清初述及清朝時政的時事劇，最有名的就是關於順治十四年(1657)江南科場案一事。順治十四年發生在江南的鄉試舞弊案，即所謂的「丁酉科場案」，因為主考方猶、錢開宗等舞弊，中試者中又有達官之子，遂引起物議沸騰，⁶⁵接著還引發了生員的集體抗議事件，據當時人陸文衡在《嗇菴隨筆》中記載如下：

⁶¹ (清)徐鼐，《小腆紀傳》，卷20〈列傳十三〉，頁213。

⁶² 《西軒紀年集》，引自張慧劍編，《明清江蘇文人年表》，頁670。

⁶³ (明)閻爾梅，《閻古全集》（民國十一年排印本），卷3，廬州見傳奇有史閣部勤王一闕感而志之詩，頁15b。

⁶⁴ (清)魯一同撰，《白菴山人年譜》（民國四年[1915]吳興劉氏上海刊本），頁7a-b。

⁶⁵ 有關此二案可以參考孟森，〈科場案〉，收錄於《明清史論著集刊》（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二版），下冊，頁391-433。

九月初四日，江南各郡生員遍貼公傳：「丁酉主試分房，違旨逆天，公行賄賂。兩江鹽商、典舖紈袴子弟，一榜盡收，孤寒厄抑，天怒人怨。若不上聞，從此制科可廢。公約本月初五日，大集文德橋文廟，哭告先師，隨赴各衙門告理，懇祈具疏。」⁶⁶

此案所以傳播開來，戲曲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據《研堂見聞雜記》記：

南場發榜後，衆大譁，好事者爲詩爲文，爲傳奇、雜劇，極其醜詆。兩座師撒棘歸里，道過毗陵、金閶，士子隨舟唾罵，至欲投磚擲瓦。

67

後來也是藉著戲曲的流佈，將此事傳到皇帝的耳中。因爲當時江寧（南京）書坊曾刊行一本無名氏所撰之《萬金記》傳奇揭露其事，以方字去一點爲萬，錢字去邊旁爲金，影射二主考官之姓，備極行賄通賄狀，隨後流布禁中，皇帝聞之震怒，遂有是獄。⁶⁸地方官偵查劇作人姓名不得，恰巧當時長洲人尤侗客浙江常山，於逆旅中作《鈞天樂》傳奇，其雖自稱乃爲娛親而作，內容純是子虛烏有，⁶⁹但據戴璐(1739-1806)的《石鼓齋雜錄》云：

順治丁酉科場大獄，相傳因尤侗著《鈞天樂》而起。時尤侗、湯傳楹高才不第，隱姓名爲沈白、楊雲，描寫主考何圖，盡態極妍，三鼎甲賈斯文、程不識、魏無知，亦窮形盡相。⁷⁰

從劇中人物與情節來看，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這齣劇是在諷刺江南鄉試科場之弊，所以會被地方官懷疑，尤侗於其〈鈞天樂自記〉中就指出：

適山陰姜侍御還朝，過吳門，亟徵予戲，同人宴之申氏堂中。樂既作，觀者如堵牆，靡不咋舌駭歎，而邏者亦雜其中，疑其事類馳白臬司，臬司以爲奇貨，即檄捕優人，拷掠誣服，既得主名，將窮其獄，

⁶⁶ (清)陸文衡，《菴菴隨筆》，卷3，頁4b-5a。

⁶⁷ 無名氏著，《研堂見聞雜記》，頁26b。

⁶⁸ (清)董含，《三崗識略》（申報館仿聚珍排印本），卷3，鄉闈異變條，頁12b。

⁶⁹ (清)尤侗，《年譜圖錄》，頁8a。

⁷⁰ (清)戴璐，《石鼓齋雜錄》，轉引自孟森，〈科場案〉，頁417。

且徵賄焉。會有從中解之者，而予已入都門，事得寢。⁷¹

從上面的記載看來，這齣戲在當時甚為流行，所以那位姜侍御才會急著想一睹為快；上演時也吸引了不少人，並引起觀眾很大的震撼，所以會被衙役告知主刑名的江寧按察使，並欲置大獄。幸而有人送賄，而尤侗也避難於北京，才得免牢獄之災。這次事件對江南創作時事劇的風氣，可以說是相當大的打擊。

如果說順治十四年因科場案的時事劇而興大獄，讓江南士大夫不敢再擅寫批評時政的劇本，那麼順治十八年(1661)的辛丑奏銷案，則是結結實實地打擊了江南士大夫的勢力。史家孟森即指出：清廷對當時以故明海上之師，積怒於南方人心未盡帖服，所以假以大獄示威。結果是使得蘇、松、常、鎮四屬官紳士子，革黜至萬數千人，且多刑責逮捕之事。⁷²這些連帶的事件都使得江南的士大夫已經不敢妄議時政，⁷³就以崑山縣的情形為例，根據乾隆年間刊行的《縣志》中記載，當地士大夫在歷經政權的轉變後，「脅息避禍，一二廉靜之士，或隱居鄉曲，不入城市，有幸而得全其志者，辛丑有奏銷一案，半歸廢斥。」所以到康熙之後，「功令嚴峻，紳士莫敢啓口及時政」。⁷⁴

《鈞天樂》的例子顯示，早在順治末年清朝政府就已開始干預時事劇的創作。從順治末年清廷一連串鎮壓江南士氣的科場案與奏銷案之後，我們已難看到批評當時政治的新題材之時事劇出現，不過描寫南明政治的時事劇還偶有佳作，孔尚任的《桃花扇》即其中之佼佼者。接著康熙以後禁演戲之法令愈加嚴格，再加上雍、乾年間文字獄興，尤其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上諭

⁷¹ (清)尤侗，《鈞天樂》(康熙年間刊本，收在《古本戲曲叢刊五集》)，〈序·自記〉，頁3-4。

⁷² 孟森，〈奏銷案〉，《明清論著集刊》，頁434-452。

⁷³ 我們可以看到明末與清初政府對士大夫批評時政的態度，有很大的差異。明末政府對士大夫相當容忍，但是到清初就不同了，地方官與役隸威加衿士，已非復昔日優文之象。參見拙作，〈明清城市民變研究—傳統中國城市群眾集體行動之分析—〉(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6年)，頁121-123。

⁷⁴ 乾隆《崑山新陽縣合志》(乾隆年間刊本)，卷1〈風俗〉，頁1、4-5。

有言：「因思演戲曲本內，未必無違礙之處，如明季國初之事，有關涉本朝字句，自當一體飭查。」⁷⁵因之此後即使是原有述及明季之時事劇都被查禁，遑論創作新的時事劇。最好的例子就是晚明清嘯生所作，描寫天啓年間魏闖時事之《喜逢春》傳奇，該劇本分別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被浙江巡撫三寶(?-1784)，以及乾隆四十三(1778)、四十四年(1779)被江蘇巡撫楊魁(?-1784)列入奏繳的禁書之中。⁷⁶由之也可見地方官查禁之嚴。在此情況下或有士大夫告戒子弟，勿造作譏諷時事之戲文，⁷⁷有的則大歎對搬演時事劇一事，「前朝（明朝）功令最寬」。⁷⁸此外，清朝以危害社會風俗為名對演劇及戲館屢申之禁令，雖然因為宮中與仕宦、商人的贊助提倡，根本無法絕禁與徹底執行，但是對劇本的主題方面確實有相當的影響，至十八世紀，原來在清初曾盛行一時以科場弊端、晚明歷史與滿漢關係為主題的時事劇，到了乾隆時都消聲匿跡了，代之而起的則是以才子佳人以及歷史故事為主題的劇本，在當時城市中特別流行。⁷⁹

綜而言之，明清之際延續明代後期以來的傳統，繼續創作出相當數量的時事劇，主題多是涉及明末流寇之亂以及南明弘光朝政權。雖然至今流傳下來的劇本數量有限，但透過一些筆記資料可知，當時這類時事劇演出時相當轟動，也引起相當多觀眾的共鳴。而描寫清初時政的時事劇多以敘述科場案為主，尤其是諷刺順治十四年江南鄉試科場案最為著名。惟至順治末年清朝政府已經開始打壓江南士大夫，之後的文字獄與禁戲的法令，都使得劇作家噤若寒蟬，不敢再寫批評時政的劇本，所以時事劇也未見再有新的創作題材出現。

⁷⁵ 《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118，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乙酉條，頁 17b-18a。

⁷⁶ 雷夢辰，《清代各省禁書彙考》（北京：書目出版社，1989年），頁 161、171、240。

⁷⁷ (清)申涵光，《荊園小語》，收入《叢書集成新編》第 14 冊（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85），造作歌謠及戲文小說條，頁 406。又見於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頁 228-229。

⁷⁸ (清)黎士弘，《仁恕堂筆記》，〈三元記當毀〉條，引自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頁 223。

⁷⁹ Susan Naquin and Evelyn S. Rawski, *Chinese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1987), p.62.

三、明清之際的時事劇與社會心態——以李玉《兩鬚眉》 與《萬里圓》二劇為例

(一) 時事劇與群眾的社會心態

明末以來流行的戲曲劇種與劇本相當多樣化，有時會因為觀眾的社會階層不同，而偏好某類劇本。⁸⁰不過，除了是在宮庭與家宅這類特殊場所演出除外，明清的史料顯示一般戲劇演出的場合，觀眾大都是不分任何階層的，可以說是「雅俗共賞」，如范濂的《雲間據目鈔》中就記當地松江府每年鄉鎮二、三月間的迎神賽會演戲的盛況，「郡中士庶，爭挈家往觀，遊船馬船，擁塞河道，正所謂舉國若狂也。」⁸¹尤其是端午、元宵這樣大的節日演劇時，真是「士女潮湧，撼動蠡城。」⁸²《吳社編》也記當地搬演社戲時，「朱門纓綬之士，白首耄耋之老，草莽鏹立之夫，建牙熊虎之客，紅顏窈窕之媛，無不驚心奪志，移動聲色。」⁸³明末喜好戲劇的名宦祁彪佳，雖然對戲劇的品味頗高，但在其日記中也常見「里中舉戲，觀者若狂」；「城中舉社戲，供東岳大帝，觀者若狂，予舉家亦出。」⁸⁴之類的記載，由此可見士大夫也多是欣賞者。可見戲劇是當時社會上下階層之間共同的喜好與娛樂。

再就劇作家而言，明末的劇作家在理論上與實際創作時，都已注意到觀

⁸⁰ 根據日本學者田仲一成的研究認為在十六世紀以後，江南地區因為社會階層的分化與「不在鄉地主」的情形愈來愈普遍，造成不同的場合，以不同的戲曲訴諸不同觀眾的分裂現象，即不同階層的觀眾喜愛觀賞不同的戲曲，形成「雅」與「俗」之分。參見田仲一成，〈十五、六世紀を中心とする江南地方劇の變質について〉（四），《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71號（1975年），頁135、76-79、127。本文並不完全反對其說法，只是覺得上下階層觀戲的興趣之間，即雅俗之間仍有重疊面，即有「雅俗共賞」之戲劇。而田仲氏之說在史學界也仍有爭論，見李孝悌，〈從中國傳統士庶文化的關係看二十世紀的新動向〉，《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19（1990年），頁331-333。

⁸¹ (明)范濂，《雲間據目鈔》，卷2〈記風俗〉，頁6b。

⁸² (明)張岱，《陶庵夢憶》，卷8，閏元宵條，頁77。

⁸³ (明)王穉登，《吳社編》，收在《筆記小說大觀》四編六冊（台北：新興書局，1978年），頁404。

⁸⁴ (明)祁彪佳，《村居適筆》，崇禎九年丙子五月七日條，頁1052；《乙酉日曆》，順治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條，頁1432。

衆的感受。當時從事戲劇創作的劇作家頗多，據清人鄒漪的估計：「明南北劇不下數百家」⁸⁵。明末已有劇作家提出「通俗化」的概念，例如吳江派的劇作家臧懋循(?-1621)關於戲曲的理論有不少精闢之見，他認為戲曲語言應該「雅俗兼收，串合無痕」，「境無旁溢，語無外假。」⁸⁶而臨江派的李開先(1502-1568)主張戲曲語言要「雅俗俱備」，「明白而不難知」。⁸⁷再就新劇的創作過程方面而言，前已提及明末以來戲劇的興盛，大多是由士大夫階層所推動的。不少士大夫親身投入編導之行列，在創作的過程時，劇作家大多將新劇交由家班演練，通常在戲房或家宅中演出，主人可藉著舞台上的反覆演練以及門客的評語，以檢示自己劇本的演出效果。有時家班也會將劇作家的新劇搬演到家宅以外的場合，而往往造成轟動，隨後即為民間職業戲班所沿用；或有家優散入民間職業戲班，進而提升民間戲班的水準。最好的例子就是張岱，他常帶家班在山亭、城隍廟、金山寺等地演出，演出當時往往吸引許多百姓圍觀。而其家優馬小卿與陸子雲後來都進入了興化大班，成為職業演員。⁸⁸從新劇的創作過程來看，劇作家最終仍是要通過一般大眾的考驗。

在實際演出時，我們也可以看到觀眾考驗劇團的例子，因為一般民眾對上演的戲碼與劇本也都有相當程度的了解，對劇團演出的好壞也會有反應，更有甚者如《陶庵夢憶》所記：「一老者坐台下對院本，一字脫落，群起噪之，又開場重做。越中有『全伯喈』、『全荊釵』之名起此。」⁸⁹這個例子雖然是觀眾對演員的考驗，但在這樣台上台下的互動過程中，劇作家也是背

⁸⁵ (清)鄒漪，《啓禎野乘》，收在《明代傳記叢刊》127種（台北：明文書局據民國25年故宮博物院圖書館排印本影印，1991年），卷6〈沈文學傳〉，頁15a。

⁸⁶ (明)臧晉叔，《元曲選》，收在《四部備要·集部》第195冊（台北：台灣中華書局據明刻本校刊，1965年），〈元曲選序二〉，頁1a。

⁸⁷ (明)李開先著、路工輯校，《李開先集》（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閒居集之五》，〈改定元賢傳奇後序〉，頁316-317。

⁸⁸ 王安祈，《明代傳奇劇場及其藝術》，頁109-112；陸萼庭，《昆劇演出史稿》，頁55-57。

⁸⁹ (明)張岱，《陶庵夢憶》，卷4，嚴助廟條，頁34。

後受考驗的人。無論是演出者或是劇作家，必然也要顧及到觀眾的態度，因之戲劇的編著者自然會迎合觀眾的口味去編寫劇本。

由此看來，當時流行劇本中的情節，是經過劇作家的創編與觀眾考驗下的成果，其中最受歡迎的劇本內容多少也反映了當時下層民衆的觀念與看法，或至少它也是代表當時民衆所能接受的觀念。前面曾提及董以寧於當塗所見諷刺阮大鍼之時事劇，演出時引起觀眾廣泛討論與迴響，這個例子證明了當時流行的時事劇，相當程度反映了一般大眾的心態，尤其是對政事與政治人物的看法。

這些劇本的內容或許與史實間有相當大的距離，本節利用明清之際留下來的時事劇本，透過內容分析並比較劇本內容與觀點，和當時史實之間的相異處，來探索大眾階層對當時的政治、社會與人物的態度與看法；另外，再從筆記、文集中找尋當時是否也有類似之看法，以呈現出歷史情境的複雜性。在此選擇當時蘇州著名的劇作家李玉的兩部劇本——《兩鬚眉》與《萬里圓》作分析。

首先應說明的是關於李玉的生平，至今的能見到的材料極少，所存者又有互相矛盾的記載。一是李玉的同代人吳偉業爲他編的《北詞廣正譜》作序，其中說李玉，「連厄於有司，晚幾得之，仍中副車。甲申以後，絕意仕進。」其次是乾隆時焦循的《劇說》稱李玉的出身是，「申相國（即首輔申時行）家人，爲申公子所抑，不得應科舉，因著傳奇以抒其憤。」又說他所著的《一捧雪》是「極爲奴婢吐氣，而開首即一云：『裘馬豪華，恥爭呼貴家子。』意固所在也。」如果李玉是出身奴僕，按照明代的習俗與法律，李玉也可能會世襲奴僕身份成爲賤民，照理是不能應考的，怎可能如吳氏所言「仍中副車」？若從交友論之，吳偉業與李玉關係極好，這可以從他爲李玉的《清忠譜》與《北詞廣正譜》作序文一事看出，而焦循時代較後，所據又無從查考，由此看來吳氏之說較爲可靠；⁹⁰又從李玉下面所著之《兩鬚眉》劇中，關於奴變的負面評價來看，李玉實不可能是出身奴僕。至於李玉的生

⁹⁰ 胡忌、劉致中，《昆劇發展史》，頁 275-77。

卒年亦不可考，只知他是由明入清的人物。出生約在萬曆年間，謝世約在康熙年間。⁹¹

關於李玉的身份與劇作的代表性方面，正因為李玉未曾得有太高的功名，所以充其量只能算是下層文人，而非上層的士大夫。⁹²可能因為這樣的社會背景，使得他接觸社會面比較廣，對下層人民比較同情，所以他的創作中顯現了一種獨特的「現實主義」風格，蘇州一些年齡略小於他的劇作家，如朱佐朝、朱素臣(約 1622-1701 以後)、畢魏、葉時章(1623-1707)等人，和他關係都非常密切，在他的影響下，形成蘇州派這種崑曲流派。一般說來，這些蘇州派作家的作品，都注意到雅俗共賞、切合舞台實際的優點，所創作的戲大多廣受職業劇班的歡迎，合于觀眾的欣賞習慣，所以常常上演於舞台。⁹³李玉是其中作品是最多，最具代表性的一位劇作家。晚明出名的文人馮夢龍(1574-1646)在〈墨憨齋重訂永團圓傳奇敘〉中，說到李玉初編劇本《人獸關》盛行的程度：「優人每獲異犒，競購新劇；甫屬草，便攘以去。」祁彪佳在其崇禎六年的日記中，也曾於一年中兩次述及觀賞李玉的傳奇《永團圓》與《一捧雪》等。他所寫的有關明天啓年間的時事劇《清忠譜》，直至康熙年間還不斷地被演出；至清乾隆年間還有劇作家接續作《清忠譜正案》。⁹⁴由此可見李玉之劇作在當時受歡迎之程度。因之，本文擬擇其所著，事涉明清之際時事的此二劇本作分析。一則是因此二劇是述及明清之際時事劇中，少數留傳下來者。再者此二劇成書的時間都是在江南發生奏銷案之前，亦即在清政府尚未開始打壓江南士大夫之前，受外力干預的成份較小，應可相當程度地反映大眾的社會心態。

⁹¹ 康熙六年(1667年)，李玉曾為袁國客重刻本《南音三籟》作序，其中提到自己的作品有「《花魁》、《捧雪》二十餘種」。現知李玉的劇本有三十餘種。他的謝世當距康熙六年更遠一些。吳偉業說他「晚」年(中年以後)才中明朝的副榜舉人，那麼明亡時，他也會有四、五十歲了。據此推斷，李玉的出生當為明萬曆年間，約西元1600年前後。參見張庚、郭漢城，《中國戲曲通史》(台北：丹青，1986年)，頁2-124~126。

⁹² 至於有人據其自述「一笠庵之東籬小廠」，而認為其過著是貧困的生活，但因史料上的局限，很難以此認定他的經濟生活狀況。

⁹³ 胡忌、劉致中，《昆劇發展史》，頁279、298。

⁹⁴ 參見顏長珂、周傳家，《李玉評傳》(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5年)，頁19、21、28。

（二）《兩鬚眉》中反映的明季流寇與政局

李玉所撰之《兩鬚眉》共三十折，描寫書生黃禹金夫婦滅賊建功事。禹金及其妻鄧氏，皆實有其人，據今人考證乃是以黃鼎事敷衍而成。⁹⁵卷首有萬山漁叟所作之《敘》文云：

一笠庵主人錦心繡腸，援筆隨風，片片霏玉，以黃絹少婦之詞，寫天懷發衷之事。今天下血性男子，閱是傳想見鬚眉如戟，甬然興敬，豈猶是宋艷荀香，描摩兒女子幽夢柔情，咿啞啞，作「曉風殘月」之調，以宕人心魄，迷人耳目已哉？

是劇寫一書生投筆以戎，剿撫群寇；其妻以一女流，墾荒活民，守寨殺賊。二人功績等同，故名《兩鬚眉》。此劇創作的時間，根據卷首敘文的時間為順治十年(1653)，以故事時代考之，當寫於清朝立國不久。⁹⁶有關黃鼎與鄧氏之事蹟，特別是黃夫人鄧氏滅賊抗清之事，在當時頗為士大夫所推崇。例如錢謙益就有〈六安夫人鄧氏詩〉詠其事。⁹⁷

劇寫明末盜賊縱橫之時書生六安州生員黃禹金，性稟豪英，志期遠大，家有一妻一妾，三兒二侄。為施展胸中韜略，與帝王分憂，毅然投筆從戎，仗劍剿撫流寇，禹金被薦於淮安漕撫史可法帳下，為贊畫督師，時李自成軍南下，荊豫震恐，禹金則分析敵情，認為剿賊有三弊：須撫土賊以孤賊援，立堡寨以絕賊糧，禁殺逃歸難民以散賊脅。遂親往三尖、麻埠、羊山諸寨，招撫鄉勇、寨勇，藉以孤立李自成軍。因其招撫及剿殺有功，委署黃州別駕。其妻鄧氏，守家教育子侄篤志勤學，並於白湖墩開闢荒田，以丈夫祿米及家中存糧賑饑。將白湖墩改名白湖寨，自為寨長。構築土城，訓練鄉勇，組織女軍，以防禦賊盜，軍令緊嚴。在其組織指揮下，大擺軍陣，剿殺賊軍，並一箭射死流寇首領左金王。史可法親往白湖寨，召見鄧氏，題贈「女

⁹⁵ 參見徐銘延，〈李玉《兩鬚眉》本事考〉，頁36-48。

⁹⁶ 今存有長樂鄭氏藏清順治刊本，《古本戲曲叢刊》三集據以影印。卷首有萬山漁叟《敘》，有圖4幅。

⁹⁷ 另外，較後之劉獻廷(1648-1695)的《廣陽雜記》與王葆心(1864-1944)的《蕪黃四十八砦紀事》二書對黃夫人鄧氏亦皆有正面的記載。

中韓範」匾額，懸掛寨中，並奏請皇帝旌獎。禹金又於黃州招募鄉勇，單騎擒獲流寇官吏，適值麻城奴變後，城降於流寇張獻忠，禹金乃招撫麻城周文江降明，又領大軍奪回武昌城，封為副總兵。其後又招流寇首領狄應魁降，殺死另一流寇首領路應標。以其功大，故升任為鳳壽督師。但因夫婦見朝事日非，於功成後掛冠而歸，優游林下，共享天年。

仔細分析其中內容，再與史書所載兩相對照後發現，劇中所述部份內容與史實相符，而有許多部份與史實頗有出入。以下就以相關之史料考證並分析該劇本之內容：

首先看劇中對流寇的描寫：在第二折〈寇猖〉中描寫當時據潛山、太湖、英山、霍山四縣夾界的流寇左金王、革裏煙（按史書多稱之為革里眼）、老回回、太子九虎與掃地王等五部首領，奉張獻忠之命，要攻掠河南六安等地。按流寇諸部合攻六安事應在崇禎十五年(1642)三月間，據史籍載除太子九虎為虛構外，其餘諸人皆確有其人，惟掃地王攻六安等地應為崇禎八年(1639)九月之事，⁹⁸至崇禎十三年(1640)掃地王降明，該年十月於四川與張獻忠作戰時被生擒。⁹⁹而崇禎十五年攻六安等地者，據史籍載應為盤據於河南、湖北、安徽三省交界地區，依托大別山脈（史稱英霍山區）的「革、左五營」，包括老回回馬守應、革里眼賀一龍、左金王賀錦、治世王劉希堯、爭世王藺養成等五營，他們向以聯合作戰而形成比較穩定的集團，其中並無掃地王與太子九虎。¹⁰⁰從該折及以後諸折形容流寇：「攘地攻城勢橫行」，「殺人如草血痕腥」；「狼衝鋒快馬跑，軍卒望風逃，旗鎗四地拋，家室屠蒿，廬舍焚燒，破州城，殺得人稀少。」這顯示該劇對流寇的描寫都

⁹⁸ 乾隆《六安州志》（乾隆十六年[1751]刊本），卷24〈兵燹〉，頁11a-b。

⁹⁹ 有關明末流寇之名稱可參證王綱，《明末農民軍民號考錄》（成都：四川社會科學院，1984年）。

¹⁰⁰ 顧誠，《明末農民戰爭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頁150-152；孫祚民，〈明末大別山區「革左五營」農民起義軍的抗明鬥爭〉，《中國農民戰爭問題論叢》（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239-260。孫氏主張五營是以賀一龍、賀錦、馬守應及其他另外兩部農民起義軍部隊所組成的。另兩部領袖名號，因時有離合變動，故難以斷定。但據史籍載皆無掃地王與太子九虎列名其中。

是負面的形象。

全劇最重要的主角黃禹金，實為影射黃鼎。在劇中黃禹金是由馬士英轉薦於史可法，史可法諮詢其制寇之良策，而黃答以除三大弊。然而據史籍載黃鼎實為馬士英之部，諮詢制寇之策一事亦是在馬士英營內。據乾隆《六安州志》載：「黃鼎，字玉耳，性孝友，弱冠補弟子員。明崇禎間流寇猖獗，巡鹽張倫序薦鼎異才。督師馬士英詢賊情形，全無應者。鼎前陳才略，辭條明暢。士英奇之，令往光、固糾合寨勇為進取計。」¹⁰¹又劇中描寫麻城奴變後，史可法令黃禹金招撫麻城周文江反正一事，史實記載則係馬士英令黃鼎入麻城招撫周文江，據民國《麻城縣志前編》〈武備志〉記載：

（崇禎）十六年四月，張獻忠竄據麻城，……先是春間闖賊至麻，旋即東去。里民明承祖及僕輩洪樓先等結里仁、直道二會，活埋殺所仇倡亂。各鄉寨鳩眾圍城討之。會眾使湯志至潛山縣地方，迎賊張獻忠，於四月初六日入城，奉以為主，改縣為長順州。遂渡江攻陷省城，安立偽官，獨朱山寨不降。時邑人周文江被陷，密約鳳陽總督馬士英內應反正，受武銜。¹⁰²

這個馬士英的內應就是黃鼎，據《小腆紀年》也記載當時鳳督馬士英屯壽州，「遣六安諸生黃鼎潛入麻城諸寨，謀之劉僑、田生蘭、周從極等，說周文江以反正，斬賊將方子雄於鱖魚套中，擒湯志數其罪而磔之，傳首壽州。」¹⁰³可是在該劇中故意將黃鼎寫成史可法之部屬，而麻城反正之功也歸於史可法，由此可見在此劇中有意降低馬士英之成份。

又關於當時在河南、湖北等地所樹立的山寨的性質，該劇中也有深入地描寫。劇中前幾折已提到，流寇多靠各地的山寨接應。在第六折〈寨盟〉中寫麻埠寨首張福寰，原是重義輕財的豪傑，曾聚眾阻賊，「不料官府聞知，百計苛求」，所以才揭竿倡義，樹黃旗，上寫：「賊來殺賊，兵來殺兵。」另一個羊山寨的首領奚惠王，在第八折〈剿虎〉中描寫其立山寨也是因為：

¹⁰¹ 乾隆《六安州志》，卷 11〈仕蹟〉，黃鼎傳，頁 30a。

¹⁰² 民國《麻城縣志前編》（民國二十四年鉛印本），卷 5〈武備·兵事〉，頁 14-15。

¹⁰³ （清）徐燕，《小腆紀年附考》（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卷 2，頁 53。

「會當百姓窮困，官府貪污，奮背一呼，聚衆十萬。」很明顯地作者以爲大部份的山寨多是官逼民反下的產物，而非真賊盜，值得同情，故最終各寨皆爲黃禹金招撫降明。以上是描寫關於河北方面的堡寨，至於湖北方面，在第二十折〈晤俠〉中記有一劉喬，字東卿，「楚之麻城人也，官拜大金吾之職，久居林下」，因爲流氛日炙，「糾集鄉勇保守石子寨，以享餘年。」顯見石子寨是鄉紳地主所建之山寨。劇中描寫黃禹金即透過劉喬的關係，才得以招撫周文江，按劉喬確有其人，然他在麻城陷後，已被張獻忠授爲錦衣衛都督，並非如劇中寨長之身份。¹⁰⁴據學者研究，河南、湖北的山間和鄉村，在明末李自成、張獻忠等於崇禎十六年(1643)渡黃河以後，即因明朝地方防衛體制的崩潰，而開始有廣建堡寨的情形出現。各地堡寨規模不一，大者多至數千人，小者不滿百人。¹⁰⁵數量多寡不一，有的一縣的堡寨就數以百計。在河南多是由大土豪所建，其中尤以「河南三寨」爲大，而三者之首領皆是地方土豪，¹⁰⁶這與劇中所述之人物形象相當符合。其形成的原因，不外是流寇兵亂、官府貪污及饑荒時疫，致使鄉民爲自保而成立山寨。¹⁰⁷這些堡寨的政治立場也各有不同，有的受明朝招撫後相當忠誠；有的是表面上順從明朝，實是「陰與賊通」；有的則是陽爲順從流寇，實則陰謀殺賊。湖北方面則大多數堡寨皆是紳土地主所建，並且有聯合的趨勢。其中尤以德安府附近地帶的黃岡、蘄水、羅田與麻城縣等地的「蘄黃四十八砦」最著名。麻城奴變時欲圍城討伐奴僕的鄉寨即屬此類。¹⁰⁸從此劇中對河南、湖北山寨的描

¹⁰⁴ 李文治，《晚明流寇》（台北：食貨出版社，1983年），頁100。

¹⁰⁵ 《明史》，卷293〈忠義五〉，魯世任傳，頁7519；（清）高斗樞，《守鄖紀略》，收入《虎口餘生記》（上海：神州國光社，1946年），頁8。

¹⁰⁶ 河南三寨是指河南府一帶的李際遇、南陽府至汝寧府一帶的劉洪起、以及汝寧府一帶的沈萬登，這三寨是當地最大的三股勢力。劉洪起爲鹽徒起家，沈萬登爲汝寧真陽縣之「大俠」，而李際遇曾歷經童生試，可能是接近富農的土豪。

¹⁰⁷ 嘉慶《汝寧府志》（清嘉慶元年[1796]刊本），卷23〈藝文〉，（明）傅振商，「直指滇南陽公修城平寇碑」，頁65b-66a。傅氏碑中指陳鄉民建寨所爲，「趨賊克兵，頭面屢換」，正和劇中張福寶建寨所言「賊來殺賊，兵來殺兵」意義一致。

¹⁰⁸ 有關明季堡寨之研究，參看佐藤文俊，《明末農民反亂の研究》（東京：研文出版社，1985年），頁61-70。

寫，可說是非常切近史實。

劇中對發生在湖北麻城縣的奴變事件有詳細的描述，基本上事件過程頗符合史實。但是對奴變的評價則是完全負面的，如第十九折〈詢探〉中形容奴變打殺其主的慘狀：「輕則擒來鞭扑，重則投火燒油，衣冠望俗一時休，奇變從來罕有。」在第二十二折〈誅狡〉中，當黃禹金招撫周文江反正後，又擒住了麻城奴變之首湯志，數其罪狀有三：「爾本賤役，立社惑眾，錯亂人倫，一罪也。事敗引賊入城，獻朝廷封疆，二罪也。賊劫去壯丁二萬七千，皆爾桑梓，送卻若輩性命，一二逃回者，爾當庇之，反割去耳鼻，甚或支解，百姓何罪至此乎，一罪也。」史載明末清初在許多地方發生了「奴變」事件，¹⁰⁹包括了江南、福建沿海地區、廣東珠江三角洲、江西贛江中游、安徽南部以及鄂、徽、豫交界處等。這些地區有的是城市經濟發達或租佃制度盛行的地區，其中又以江南地區（金壇、嘉定、南匯、太倉、溧陽等縣）發生奴變的次數最多。¹¹⁰在時間上，奴變尤其多集中發生在甲申、乙酉年間(1644-1645)，有些江南的文獻曾將當時江南奴變與湖北麻城民變並提，如清人吳騫(1733-1813)在《桐陰日省編》中說到為何這兩個地方易起奴變：

明末鄉官家僮至以千計，謂之靠勢，豪橫桀驁，最為鄉閭所苦；而楚麻城及三吳嘉定、金壇尤盛。迨申酉間，群奴揭竿倡亂，邑紳盡受其殃。¹¹¹

¹⁰⁹ 有關明末清初的奴變的研究已有相當多成果，較重要且與本篇有關者有以下諸篇論文：謝國楨，〈明季奴變考〉，《清華學報》，卷 8，期 1（1933 年），頁 1-27；中山八郎，〈晚明の奴禍、奴變〉，《歷史教育》，卷 10，號 11（1936 年），頁 53-58；傅衣凌，〈明季奴變史料拾補〉，《福建協大學報》，期 1（1949 年），後收入氏著，《明清社會經濟史論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年），頁 381-387；傅衣凌，〈明清之際的奴變和佃農解放運動—以長江中下游及東南沿海地區為中心〉，收入《明清農村社會經濟》（北京：三聯書店，1961 年），頁 68-153；田中正俊，〈民變、抗租奴變〉，收入《世界の歴史》11（東京：筑摩書房，1961 年），頁 62-69；森正夫，〈一六四五年太倉州沙溪鎮における烏龍會の反亂について〉，《中山八郎教授頌壽記念明清史論叢》（東京：燎原書局，1977 年），頁 195-232；吳振漢，〈明代奴僕之研究〉，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1 年，頁 215-51。

¹¹⁰ 森正夫，《中國民衆叛亂史 4 明末~清初》（東京：平凡社，1979 年），頁 130-133。

¹¹¹ 轉引自謝國楨，《明末清初的學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251。

在此劇雖然寫的是湖北麻城奴變，其實是反射出江南奴變的情形。

劇中的這種寫法相當程度反映了當時江浙人民對奴變的看法，過去大陸學者將「奴變」視為「階級鬥爭」的典範而大加贊揚，但是當時即使是一般老百姓與市民，不見得就會贊同此種「階級鬥爭」。其中道理可分兩個層面來說，首先是奴變的組成份子複雜，並不只是單純的奴僕所組成，還有其它一些城市內的「無賴浮遊」階層—包括了雇傭工人、菜販、牙兵等，甚至還有生員之流以及鄉村的佃僕、佃農加入。¹¹²這些參與份子的複雜性，會影響其行動的規模與目標。其二是奴變的受禍者雖是以仕宦富室之家為主，但一般平民亦可能受池魚之殃。若就事件的形成原因來說，其實奴變可以分為二類：一類是為了要削奴籍而索賣身契；第二類是純粹是利用明清之際，朝代過渡期間所出現的公權力真空狀態，聚眾劫奪土地或金錢，如同盜匪一般。然而這兩類奴變在明清之際都陸續出現，並無明顯比重多寡差異。¹¹³後者形同盜匪，倒處打家劫舍；而前者雖然目標較明確，但也帶來不少災難。例如順治二年(1645)太倉烏龍會之亂，傳聞清兵渡江後該團整裝，「鳴鑼吶喊，銃聲四起，遊行街中，民惶怖伏，竟夜不安枕。」他們又與鎮東無賴數百人為敵，相持於鎮東吳家橋，「自晡至夕，砲聲不絕，及晚乃散。是夕奔走者復累累，蓬門破屋，填塞子女。」¹¹⁴同年江蘇溧陽縣奴變，「彭氏僕潘珍等削鼻作亂，藉名城守，四出屠劫。」¹¹⁵同年江蘇崇明縣奴變，「糾黨名索

¹¹² 參見拙作，〈明清城市民變研究—傳統中國城市群眾集體行動之分析—〉，頁 167-68；田中正俊，〈民變、抗租奴變〉，頁 67-68。

¹¹³ 雖然第一類的奴變類似已有階級矛盾的情形，但是第二類的奴變則並不是因為「奴僕」的身份被主欺壓而反抗，目的也並不是為了脫離奴籍，因此，反映的就未必是階級的問題。參見拙作，〈明清城市民變研究—傳統中國城市群眾集體行動之分析—〉，頁 166-167；又田中正俊亦將之分為兩類，一類為殺害舊主，欲投新主者；一類為索契以求人身自由者，他認為前者只為改善其經濟地位，並不算是「階級鬥爭」。參見田中正俊，〈民變、抗租奴變〉，頁 64-65。

¹¹⁴ (明)無名氏，〈研堂見聞雜記〉，頁 2b。

¹¹⁵ 嘉慶《溧陽縣志》（嘉慶十八年修，光緒二十二年刻本），卷 8〈武備志·附兵事〉，頁 9。

券，焚掠無虛日。」¹¹⁶又如同年安徽黟縣奴變，「宋乞即率諸寨之眾，攻破九都舒民一村，焚殺慘甚。」¹¹⁷由此可知當時奴變造成的社會動亂，不只是紳士富戶，連一般的老姓也受牽連，而有亟思回復安定的想法。

有關禹金之妻鄧氏方面，劇中描寫她上書阻官兵擾害良民，並密擒搶糧首領解官府正法。更重要的是她散米賑饑，又在白河墩招難民開闢荒田，將白湖墩改名白湖寨，自為寨長。構築土城，訓練鄉勇，組織女軍，置備火器，以防禦賊盜，軍令謹嚴。流寇左金王等欲攻城劫火器，但在鄧氏之組織指揮下，大擺軍陣，「婦女守住內城，在城上高執旗鎗行走，以張聲勢」，「男人守外城，用著鳥銃火砲，打殺許多流賊」，並且鄧氏又一箭射死其首領左金王，事後革裏煙欲報仇而來攻，亦被其擊退，史可法並曾賜匾。此事乃史實，乾隆《六安州志》與嘉慶《六安州志》所附張彥縉的〈白湖御寇記〉都有詳細而相同之記載。¹¹⁸惟其中射死左金王一節，雖然兩部《州志》亦如是記載，然據《明史紀事本末》與《明季北略》等書的記載，左金王與革里眼是在崇禎十六年(1643)三月十日，於李自成的酒宴上為李氏突襲擊殺且併其眾。¹¹⁹可見鄧氏射殺左金王一事乃誤傳，但當時人頗有信者，當時李玉可能也是因為道聽途說左金王可能是死於鄧氏之手，遂將此情節搬演入戲，而隨戲流傳後觀眾也信以為真，以致清代以後的《州志》中亦如是記載。

再論黃鼎個人，在該劇前幾折提到黃禹金至麻埠寨招撫寨首張福寰一事，若依該劇演事時間，當在崇禎十五年(1642)時。然據《六安州志》記載，黃鼎於順治二年(1645)清軍南下後即降清，後來為清朝立了不少功，總

¹¹⁶ 民國《崇明縣志》（民國十九年刊本），卷 11〈人物·孝友〉，頁 14。

¹¹⁷ 同治《黟縣志》（據清嘉慶十七年[1812]修，道光五年[1825]續修，同治十年[1871]重刊本影印），卷 15〈藝文志〉，程功，「乙酉紀事」，頁 27-28。

¹¹⁸ 乾隆《六安州志》，卷 13〈列女〉，鄧氏傳，頁 13b；嘉慶《六安州志》附張彥縉的「白湖御寇記」，本書未見，參看徐延銘，〈李玉《兩鬚眉》本事考〉，頁 44。

¹¹⁹ (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北京：中華書局，1977 年），卷 78〈李自成之亂〉，頁 1352；(清)計六奇，《明季北略》（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卷 19，李自成襲殺革左條，頁 358-59；(清)彭孫貽輯，《平寇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卷 6〈崇禎十六年〉，頁 130。

督馬國柱題留軍前參決機務；順治七年(1650)時，張福寰仍盤據於麻埠，黃鼎備陳進剿形勢，將張福寰殄滅。¹²⁰看來黃鼎也是個貳臣，他不但投降了清朝，而且還主動獻策剿滅反清的山寨張福寰，完全與該劇說黃禹金招撫張福寰與結局說他「掛冠而去」相反。然而作者李玉為何以他的故事作樣本，可能是因黃鼎是明季亂世書生投筆從戎的典型，其功業也是明顯可書，故以其事跡為題材。但是因為黃鼎降清，遂不得不用黃禹金為名，又假託他最後辭官歸隱，以此降低這位劇中英雄在真實世界中的矛盾。

劇中又穿插了一些丑角，他們或是因戰敗卻委過他人的明朝武將，或是因別人戰勝而爭功的地方官與武臣。如第九折〈晏功〉的總兵馬良材，被史可法派往救六安州，卻按兵不動，州陷後又委過給別人；見禹金有功，則不以為然。第十五折〈冒爭〉中又塑造了兩個丑角爭功。一個是六安知州朱方孔，「但求得上司心愛，那管他百姓當災」；一個是防守參將秦冒功，「上陣時全憑奔快，吃兵糧好似狼豺」。兩人爭著割白湖寨所剿殺之流寇的首級，以好報功。按當時六安州知州名叫朱謀赤，因被將領覃世勛所毆辱，當流賊來攻時遂降於流寇。¹²¹從姓氏發音來看，劇中朱方孔實暗指朱謀赤，秦冒功乃暗指覃世勛。而取名「方孔」與「冒功」，實乃諷刺地方官貪財、武將爭功之個性。其實這些內容的安排也反映了江南人民對明末地方官與武將的看法，這不只是在此劇中，在下面要談的《萬里圓》以及當時其它的劇本中，也常見此類的描述。¹²²

綜觀此劇對忠臣的描繪相當深刻，對流寇與山寨的評價大相逕庭，對奴變則大加譴責，又充份描寫出明末地方官與武官的劣行。

（三）《萬里圓》所反映的明清之際政局與社會情況

《萬里圓》又作《萬里緣》，全劇共二十六出，演蘇州人黃向堅萬里尋

¹²⁰ 乾隆《六安州志》，卷 11〈仕蹟〉，黃鼎傳，頁 30b。

¹²¹ 王綱，《張獻忠大西軍史》（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 166。

¹²² 又如順治七年朱英所著的《倒鴛鴦》傳奇，內容雖是描述明季二女避難之事，但劇中也有一个丑角是明朝的武將。他怯於戰陣，卻勇於劫掠，名叫烏合，號之衆。

親事。今存最完整的是程民玉霜篋藏舊鈔本，《古本戲曲叢刊》三集據以影印。字跡不清，賓白爲後加者，無目次，無出名，上捲十四出，下捲十二出，似爲原稿本。另外，乾隆年間錢德蒼所增輯的《綴白裘》收有其中的三出，名爲〈跌雪〉、〈三溪〉與〈打差〉。¹²³若將之與抄本比較，在內容上是大同小異，《綴白裘》所收三出在文字較抄本文雅，又省略了部份文字，然無關全劇之完整性。以下之內容分析主要以抄本爲主，另參卓《綴白裘》本。

該劇之本事源自清初人黃向堅自著之《黃孝子尋親紀程》，¹²⁴此故事在清初甚爲流行，尤其是在江南。¹²⁵而該劇成書確切時間不可考，但從內容及流行的時間來看，約作於清初。清人王抃在其年譜中記載，順治十八年(1661)召劇班於家宅內搬演《萬里圓》之情景：

辛丑三十四年（順治十八年），是年大人七十，於正月中旬豫慶。召申府中班（按：即明首輔申時行之家班）到家，張樂數日，第一本演《萬里圓》，時人黃孝子事，見者快心悅目，真千古絕調也。¹²⁶

該劇內容在時間上是寫到順治十年(1653)左右，而順治十八年(1661)時已演此劇，因之成書時間當在順治十年至十八年之間。清人顧公燮的《消夏閒記摘鈔》也云：「明孝廉黃雲美，周忠介公門人也，爲雲南大姚令。鼎革後，其子向堅，於干戈載道之中，跋涉山川，迎二親回蘇。自順治二年暮出門，至十年始歸故里。有作《萬里緣》傳奇以演其事者。」¹²⁷由此可見該劇作爲真人真事之題材，在當時應頗爲流行。其中〈打差〉等出，至今尚有演出者。

¹²³ (清)玩花主人輯、錢德蒼續選、汪協如校，《綴白裘》（北京：中華書局，1931年），其中九集卷二、六集卷二、八集卷二分別收有《萬里圓》中之三出。

¹²⁴ 《黃孝子尋親紀程》內分三部份：《尋親紀程》、《滇還日記》及歸莊著〈黃孝子傳〉等。今見於《筆記小說大觀》23編3冊（台北：新興書局，1985年）。

¹²⁵ 清初許多詩人亦有詩記之，如蘇州府人周茂蘭的〈黃孝子端木尋兩親于滇中迎歸故里〉及韓洽的〈黃孝子端木萬里尋親〉二詩。見《清詩紀事(明遺民卷)》，頁194、718。

¹²⁶ (清)王抃，《王巢松年譜》，頁796。

¹²⁷ (清)顧公燮，《消夏閒記摘鈔》，收在《涵芬樓秘笈》（台北：台灣商務，1967年），卷上，黃孝子條，頁15b-16a。

該劇描寫明朝末年，有蘇州人黃孔昭，字含美，晚年得一官職，授雲南大姚縣尹。遂攜夫人朱氏與侄黃向嚴，前往上任，留兒黃向堅與媳、孫看守家業。孔昭至任所不久，明即亡，北京淪陷，南明小朝廷新建，奠都南京，皇帝朱由崧沉溺聲色，不理朝政，使忠臣無用武之地。且清兵南下，江、楚、兩粵又連年戰爭，交通斷絕。而雲南地處邊疆，書信不通。孔昭乃辭退官職，隱居白鹽井。向堅與雙親九年未見，日夜思念，遂決意拋下嬌妻幼子，前往雲南，尋訪並迎接雙親返回蘇州。途中，大雪紛飛，盜匪搶劫，洪水攔阻，兵禍橫行；歷盡千辛，方抵目的地，得見雙親。孔昭夫婦亦思念家人已久，一日，閱李卓吾《續藏書》，有孝子王原千里尋父事，不禁悲從中來；待見兒亦不勝悲喜，遂即整頓行裝，返回蘇州故里，合家團聚。

此劇作者意在表揚黃向堅孝敬雙親，但同時表現出當時政治與社會的諸多內容，以下細部分析該劇內容：

前面幾出論及南明朝廷的諸多怪現象，在第三出內，首先由史可法道出開場白：「幸今上渡江，督臣推戴，定鼎留都，宗社有主，老夫待罪宰相，視師江淮，怎奈驕將悍卒，日費□□；權宰奸臣，交相蒙蔽，皇上宴樂于宮帷，文武恬嬉于輦轂。」於是他上京面君哭奏，要求誓師遣將，發帑輸糧，卻巧遇武將黃得功(?-1645)。黃原駐札滁、和二州，援剿楚豫流寇，「奈何朝廷不發糧餉，屢次上本，俱被奸臣阻遏。」只得親自渡江面君，剛好碰著史可法，兩人遂同心面上。另一方面，在第四出中描寫奸臣馬士英最為透徹，他自云：「舊歲賊破京城，諸藩南徙，重臣紛紛議立，各懷其貨可居，被我獨立推戴今上，定鼎南京，我就送他一個逍遙快活的皇帝，難道他不會封我一個深根固蒂的閣老，我把朝政一手拿住，文武升遷，禾糧出入，盡歸吾掌。」他見史、黃二人欲面聖陳情，遂與親信兵部侍郎阮大鍼從中阻撓，致二人終不得親見暢言。二人面上不成，乃往執問馬士英。然此時卻傳明將左良玉(?-1645)以清君側（「問罪朝中宰相」，「歸奸黨把朝綱再創」）為名，率兵來攻。劇中則寫史可法為此攸關宗社，只好令黃得功率重兵前往阻止左兵，自己隻身防守江淮。

據史籍之記載與上述之劇情頗有出入。要求誓師遣將、發帑輸糧，以及

屢被奸臣阻遏不發糧餉二事，實為同一件事，俱是史可法於崇禎十七年(1645)八月所上之奏疏。而阮大鍼被馬士英擢為兵部侍郎一事，亦在同年八月之事。¹²⁸黃得功從未曾有請餉之舉，且黃為史之部屬，根本不可能會如劇中之描述同時出現而相禮如賓，大概因為史可法部中只有黃得功較善戰，且一直忠於朝廷，所以他在《兩鬚眉》與本劇中的形象都很好。又左良玉營兵變清君側事件發生是在隔年四月間，是馬士英下令調集黃得功等重兵阻左兵，而讓史可法輕兵守江淮，終致揚州為清軍所陷，而史可法殉國。¹²⁹此劇中把諸多事件集中在兩出演完，看似不符史實，但意義則很接近，而且更見作者在編劇上之功力。

劇中對馬士英與阮大鍼二角的描寫，可以看到南明小朝廷昏憤荒淫，只圖享樂，不顧國家安危。特別是對南明君臣癖好戲劇一節，劇中寫左鎮兵變經史可法處理後，馬士英亦是更加快活起來，兵部侍郎阮大鍼說：「到晚生家裡去，有新教的女戲，作幾齣看看，散悶如何？」按史實亦有如是記載：「弘光好伶人，與唐莊宗同」。馬士英與阮大鍼更是私買歌女寄養於家，並準備獻給弘光帝。阮自己也作《燕子箋》雜劇以進。當端午百官入賀時，弘光卻以觀演劇為由而不視朝。甚至到了清兵渡江之時，已經準備逃亡前，還要集梨園演劇，與後宮宦豎酣飲後才出亡。¹³⁰

劇中對薙髮令發佈後江南抗清的情景亦有描寫，在第十出中記黃孔昭於雲南遇一明朝逃難之川兵前來投宿。該兵原守南京，自城破後歷經浙、閩、粵、桂等省才到雲南。當黃孔昭詢問其家鄉蘇州之情形時，從川兵口中敘述了清初江南地區抗清的景象：

[外]（黃孔昭）為什麼殺起來？

¹²⁸ 《明史》，卷 274〈史可法傳〉，頁 7017；(清)查繼佐，《罪惟錄》，收在《筆記小說大觀》45編2冊(台北：新興書局，1987)，卷 9上〈抗運諸臣傳〉，史可法傳，頁 1530；(清)徐鼎，《小腆紀年附考》，卷 7〈清世祖順治元年八月〉，頁 255-256。

¹²⁹ 當時弘光亦主守清兵，而馬士英厲聲指責主應防左良玉之北兵，而弘光默然，諸臣咋舌。事見(清)計六奇，《明季南略》(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卷 3，議禦北兵條，頁 201-202；(明)李清，《三垣筆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卷下，頁 104。

¹³⁰ 參見胡忌、劉致中，《昆劇發展史》，頁 253-254。

[淨] (川兵) 清朝官府坐了，蘇州那些百姓一個個投順了就罷了，誰想湖內多蜂起，城外夜焚燒。

[外] 那些官府怎麼樣？

[淨] 惱了清朝官府，把天門閉了，發兵馬摧枯拉草。

[外] 那些湖中人可曾剿？

[淨] 那些湖中人多是沒用的，使得家伙多是木槍木棍，被清朝兵馬一殺殺出來是，紛紛解散盡潛逃，只是可憐壞了城外百姓，池魚林木府寺糟。

[外] 怎麼壞了城外百姓？

[淨] 清朝官府只道城外百姓作反，發出兵馬，不管好歹，燒殺砍殺，慘不可言。

以上所述之「湖中人」應是指以太湖為根據地抗清義軍，他們是由以吳易為首的鄉紳，結合湖盜赤腳張三及前明水師魯之璵(?-1645)等所組成的。在順治初年江南抗清的活動中，他們以太湖為根據地向東、西、南三面出擊，支援蘇州、吳江、長興、湖州、宜興等抗清同志，是清兵最頭痛的問題。¹³¹順治二年(1645)閏六月間太湖義軍劫蘇州府獄，並焚燒城樓，還得到不少城內士民的響應，後來引發清兵屠城。¹³²但這段話卻充份反映了當時江南人對抗清的另一種看法，認為抗清只會帶給一般百姓更多的痛苦。其實當時江南抗清事件中確有人具類似之看法，最好的例子就是著名的「嘉定三屠」事件的所在地江蘇嘉定縣，在清將李成棟(?-1649)來攻時，城內人有一派如進士黃淳耀(1604-1645)等主張堅絕守城抵抗，但另有一批士民不主張作頑強的抵

¹³¹ (明)南園嘯客，《平吳事略》，收在《虎口餘生記》，頁 112；(清)計六奇，《明季南略》，卷 4，吳江吳易條，頁 261-262；司徒琳著、李榮慶等譯，《南明史(1644-166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頁 52；魏斐德，《洪業—清朝開國史》，頁 618-19。

¹³² (清)顧公燮，《消夏閒記摘鈔》，卷中，平定姑蘇本末條，頁 36a-b；(明)南園嘯客，《平吳事略》，頁 112；無名氏，《研堂見聞雜記》，頁 6a-b。主張屠城者，一說為總兵土國寶，一說是都督李延齡。

抗。¹³³而且此劇形容這些號稱抗清的義軍，又多是烏合之眾，難成大事。這種看法在一些清初士人的筆記中，也可以看到類似的說法。如康熙十年(1671)出版的《明季南略》作者計六奇說道：

至是一二士子率鄉愚以抗方張之敵，是以羊投虎，螳臂擋車，雖烏合百萬，亦安用乎！然其志可矜矣，勿以成敗論可也。¹³⁴

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舉人溫睿臨所著之《南疆逸史》中，也用諷刺地口吻敘述那些江浙響應抗清的士大夫：

然皆文士，不知兵，而所聚率市井無賴子，見敵輒蹶，迄於無成。¹³⁵

在第五出與第六出中分別提到雲南元謀縣土司吾必奎（又作吳必奎）與臨安土司沙定州二人，趁明季政權衰弱時起而叛變事，殺至沐王府，王爺沐天波只得攜家逃難。這段期間西南兵荒馬亂，第七出中透過當時已任大姚知縣的黃孔昭口中娓娓道來：「誰想吳魁才除，沙賊又反；沙囚乘爾削平，川兵又據全省。楊道台血戰被擒，大姚縣痛遭屠戮。」最終黃孔昭也只得辭官歸隱。這正說明了當時雲南混戰不休，戰亂造成百姓顛沛流離之苦等。

至於劇中反映了對清朝的看法，可以從最後一出看到。此出寫黃向堅同其父孔昭等一行人歸鄉，其間瞞過關津官兵之盤問，待到明清交界處，黃向堅云：「爹爹此處已是夾界所在，前面是清朝地方了，爹爹、兄弟多要薙髮改妝了。」其父則答曰：「這個自然是，空囊寂寞何須遠，破衲飄肖歲月侵。」看來劇中的黃孔昭雖然曾是明臣，但對清朝政權並不排斥，心理上對薙髮令亦無太多的抗拒。這也許反映了當時部份人們對明清易代的感受，以及對清朝薙髮令的看法。薙髮令可能並非真如史籍所見，引起大多數人的同

¹³³ Jerry Dennerline, *The Chia-ting Loyalists: Confucian Leadership and Social Chang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292; (明)朱子素,《嘉定屠城紀略》,收在(清)留云居士輯之《清季稗史》(上海:上海書店,1988年),頁268-269,記當時有與黃淳耀同科生員葛麟與二力士,勸其「天下事尚可為,然君儒者,非其倫,幸勿鹵莽」,遂掉臂而去。

¹³⁴ (清)計六奇,《明季南略》,卷4,總論起義諸人條,頁278。

¹³⁵ (清)溫睿臨,《南疆逸史》(香港:崇文書店,1971年),卷14〈列傳第十〉,夏允彝傳,頁98。

仇敵愾，致各地紛起抗清。這與前面那位川兵所述之意見相呼應。

第二十二出〈打差〉是該劇最有名的一出，也是至今仍上演的部份。劇中描寫一個江寧按察司差官，自云：「省下差官非輕小，到處人驚倒，錢財占大包。」到了蘇州後想藉提蘇州偽官黃孔昭入獄一事圖利，遂要吳縣公差王蒸龍（《綴白裘》本作「黃蒸龍」）帶領提人，但黃孔昭一案業已經恩赦豁免，公差又藉此來黃家索酒索食，正巧遇見黃孔昭族侄黃承佑（《綴白裘》本作「黃尚枝」）。承佑向以忠義豪俠自許：「謾說吳中多義俠，由來江夏舊家聲」；正值途中遇此二差拉人，乃抗辯二差，大喊：「又不是彌天大罪犯王條，怎容得官家提騎恁雄驍」，遂仗義而將二差毆辱一翻。二差抱頭鼠竄，王蒸龍向另一差官埋怨道：「我原說這樁事已赦過的了，不要去罷，都是你說張老爺回來占了多少銀子；李老爺回來，賺了多少銀子！今日賺的銀子在那裏？」從劇中的描寫可以看到兩個有趣的現象：一是清初派往江南的地方官貪污的情形，恐與明末無分軒輊；一是作者李玉在此劇中重覆了其在《清忠譜》描寫天啓六年蘇州城市民變時，聚眾毆東廠緹騎之寫作技巧。前者更具有意義，因為在南京淪陷後，江南地區人民紛紛起而抗清雖是在清廷公佈薙髮令以後，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此時清朝任用為招撫各州縣的人物，幾乎多是當地的紈袴子弟，早已引起地方上的不滿；清朝所派往地方的吏胥，不是凌辱士紳，就是往往乘政治混亂之機魚肉百姓，更激化了人民的恨怒。¹³⁶《南疆逸史》中敘述了薙髮令前後的形勢變化：「適下令薙髮，鄉民皆懼，而胥吏乘勢魚肉民，民洵洵思亂。」¹³⁷最好的例子是清遣的安撫官至松江府時，「有常指揮者，執而役之，遍括郡人助餉，郡人苦之，共推（沈）猶龍起兵」。¹³⁸另外，嘉定之所以反，係因清將李成棟以水陸兵駐吳淞時，「所過攘掠，民憤甚。會薙髮令下，郡邑洵洵，揭竿四起。」¹³⁹由

¹³⁶ 郭松義，〈江南地主階級與清初中央集權的矛盾及其發展和變化〉，《清史論叢》第1輯（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125-26。

¹³⁷ (清)溫睿臨，《南疆逸史》，卷36〈列傳三十二〉，死事列傳，頁254。

¹³⁸ (清)溫睿臨，《南疆逸史》，卷15〈列傳第十一〉，沈猶龍傳，頁103；(清)徐鼐，《小腆紀傳》，卷39〈義師一〉，沈猶龍條，頁472。

¹³⁹ (清)徐秉義，《明末忠烈紀實》（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卷16〈效死傳〉，

《兩鬚眉》與《萬里圓》二劇中，反映了當時百姓不但對南明官軍沒有好感，更不滿新派來的清朝地方官乘機漁利。而江南人民的抗清，從另一角度來看，並不是對抗清朝的政權或薙髮令，而是反抗清朝派駐江南的地方貪官。¹⁴⁰

綜觀此劇，在時間排序上正可以接續上節演明季時事的《兩鬚眉》傳奇，在主角上也接續前劇，述及南明朝史可法與馬士英等人物，對忠奸之辨的描寫，承續了上一劇本的觀點。劇中更透露出對江南抗清運動及清朝薙髮令的特殊看法；再從一些劇中的人物描述，反映出地方貪官是當時人們痛恨，並可能造成抗清運動的原因。

四、結論

本文試圖由政治、社會與經濟的角度來分析明代中期以來，以江南為中心的戲曲發展，到了明清之際時的變化。其次討論明代中期以來的時事劇，在明清之際從興盛至衰微的過程。並且藉由透過對蘇州曲派的代表劇作家李玉的兩部作品之分析，來說明當時一般大眾對政治時事與政治人物的看法與態度。

明代中期以後江南經濟的發達，造就了南方戲曲的蓬勃發展。至明清之際江南城市與農村經濟雖已衰退，但因未遭流寇之亂，離北方又遠，新聞傳播之訊息遲緩，使士大夫與富室未覺世局已岌岌可危，而依舊樂衷於演戲。而百姓則面臨空前之災荒與時疫，只得透過演戲的方式以祈神禳災，並藉此抒發心中的不安全感，祭祀演劇的盛行遂成為普遍的現象，也使江南戲劇維持不墜。清軍南下時江南並未有太多的抵抗，至薙髮令發佈後雖曾引起江南

侯峒曾條，頁 317。

¹⁴⁰ 明代後期以來江南即有反地方官士變的傳統，但不過是將地方官驅逐出城，而清初江南的抗清是殺地方官後據守城池，在手段與程度上很大的差別。有關明末江南的反地方官士變，參見夫馬進，〈明末反地方官士變〉，《東方學報（京都）》第 52 期（1980），頁 595-622；夫馬進，〈明末反地方官士變補論〉，《富山大學人文學部紀要》第 4 號（1981），頁 19-33；拙作，〈明清城市民變研究—傳統中國城市群衆集體行動之分析一〉，第五章，頁 117-136。

各地起而抗清，然不久即平定，部份城市與地區所受影響較小，故演劇之風仍持續，尤其是蘇州曲派的形成，造就了崑曲的另一高峰。

明代中期以後興起以當代政治或人物為題材的時事劇，到了明清之際仍有許多新的創作，主題環繞著晚明流寇之亂及南明弘光朝政事，清初還流行諷刺科場案之時事劇。這些時事劇在當時都曾造成相當程度的轟動，引起大眾的共鳴。然而順治十四年(1657)因時事劇揭發江南鄉試科場弊案後，清朝政府已開始注意士大夫與文人創作的時事劇。接著奏銷案打擊江南士大夫，雍正乾隆年間的文字獄也加深了對文化的控制，甚至連述及明季政事之時事劇亦遭禁演，終使得時事劇漸漸銷聲匿跡。直到清末的戲曲改良運動時，以當代政治時事為題材的時事劇，才又再度興起，其中不少是用來宣傳革命思想，或諷刺、暴露清朝政府的腐敗。¹⁴¹

明末以來流行的時事劇在內容上，相當程度反映了一般社會大眾的心態，尤其是對政治時事與政治人物的看法。時事劇提供了我們瞭解當時歷史的另一種途徑。而明清之際蘇州派的開山始祖李玉，其所創作的劇本一向被公認是最平民化，最講「現實主義」，也是最被民衆所喜愛的一位。故本文透過分析其所著的《兩鬚眉》與《萬里圓》二劇，來看當時江南民衆對明清之際的時事與人物的看法與態度。

從兩本劇本中反映了當時的江南面臨的幾個層面的問題：如忠臣與奸臣之辨、流寇的紛擾、地方官的貪污腐化、地方治安與變亂相繼出現（如奴變與寨堡）、政權交替時期百姓痛苦等。對流寇的態度是完全負面的，不問其動機為何，一概以土匪視之。而對山寨則抱有較多的希望，認為是官逼民反下的產物，是值得同情也應加以招撫。對於奴變則頗不以為然，即使一般老百姓可能都會遭池魚之殃，所以並不贊同奴變之作法。劇中描述的南明政權，反映人們對弘光的無能，以及馬士英與阮大鍼亂政的痛恨。實則江南人

¹⁴¹ 歐陽予倩，〈談文明戲〉，收於《歐陽予倩戲劇論文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4年），頁185；上海藝術研究所與北京藝術研究所編，《中國京劇史》（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90年），頁322-323；李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啓蒙運動：1901-1911〉（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頁191-210。

民對弘光政權的看法，已不像對崇禎皇帝一般的尊敬，主要因為江南人民已可親歷此政權腐敗的一面。江南人民甚至將弘光朝無一善政，用馬士英為相，賣官鬻爵與賄賂公行的行為，編成許多諷刺的歌謠傳誦。¹⁴²時事劇則是反映人們對弘光朝不滿的另一種形式。所以當弘光被捉回南京時，百姓夾街唾罵擲瓦。¹⁴³而這兩齣劇中都會出現的主角史可法，則是呈現完美的忠臣形象。事實上，江南人民於明清之際時「忠義精神」特別明顯，如蘇松地區士民燒打降逆諸臣家宅的行動，¹⁴⁴恰與劇中貶抑馬士英之功，而提升史可法的「忠奸之辨」寫法相呼應。劇中反映出江南人民對明末的地方官與武臣雖無好感，但是對清初派駐江南的地方官更覺厭惡。對清朝的政權與薙髮令，並不因其為外族而心生抵抗，反而是地方官的魚肉鄉民更令人怨恨。至於對抗清運動的看法，認為多係烏合之眾，復明毫無希望，徒增百姓死傷，造成百姓顛沛流離之苦等。這與一般看到江南士民同仇敵愾，為反異族之薙髮令而抗清之形象，大異其趣。其實在一些清初的筆記小說中，對這類現象也有類似的看法，¹⁴⁵如是具有此類看法與態度者，並無分上下階級，其呈現的是江

¹⁴² 有關諷刺弘光朝的歌謠，詳見(明)談遷，《棗林雜俎》，收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雜家類》113冊（台南：莊嚴文化據上海圖書館藏清鈔本翻印，1995年），〈仁集〉，民謠條，頁27；(清)姚廷遴，《歷年紀》，收在《清代日記匯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卷上，頁55。

¹⁴³ 有關弘光被捉回南京後遭百姓唾罵一事，記載頗多，參見《清史稿》，卷235〈圖賴傳〉；(明)談遷，《國權》，卷104，頁6216；(清)計六奇，《明季南略》，卷4，「劉良佐挾弘光回南京」條及「弘光拜豫王」條，頁222-224；(清)徐鼐，《小腆紀傳》，卷2〈弘光紀下〉，頁25。

¹⁴⁴ 明季蘇松士民燒打降逆諸臣家宅一事，見於(清)葉紹袁，《啓禎見聞錄》，卷3，崇禎十七年條，頁8a-9a。及(清)曾羽王，《乙酉筆記》，收在《清代日記匯抄》，頁16。

¹⁴⁵ 司徒琳指出在明清之際出身的一代，是處在一種左右為難的矛盾，一方面是對前朝的忠誠思想與前輩抗清遺事的影響，但另一方面卻是對仕清的遲疑與功名前途的不確定感，於是文風上有所改變，對經典解釋的懷疑與強調實證之風興起，一轉過去文人研究的重點（如重要政治人物、黨派鬥爭以及理學爭論），而開始重視小人物與英雄俠士等，或研究過去不受重視的朝代。參見 Lynn A. Struve, "Ambivalence and Action: Some Frustrated Scholars of the K'ang-shi Period", in J. Spence & J. Wills ed, *From Ming to Ch'ing: Conquest, Region, and Continui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 Press, 1979), pp.326-340.可能正因此原因，他們的作品中對抗清是帶有同情但卻又語帶譏諷。

南人民一種心態。

最後，想用明季浙江海寧的理學家陳確(1604-1677)的一首詩〈鹽州篇〉來結束本文，這首詩中正好也反映了這個時代下的社會心態：

崇禎末年弘光元，世亂民愁不可言。處處鄉兵能殺人，青天白日魂號冤。貧兒驟飽富兒餒，兇人久活善人死。吾邑鹽官親見聞，大第高門盡燼煨。義軍百萬真貔貅，焚家劫藏勇赳赳。一旦驕兵千騎來，甲士雲散衣冠愁。昔日承平風俗惡，鄉官豪橫恣群僕。沿村撲捉吏不呵，須臾出反悲今昨。紛紛報復總成虛，大家小家同歸無。朝攫千金暮殺軀，嬌妻掩哭胡兒驅。嗟哉世人宜稍悟，今不一悟無乃愚。¹⁴⁶

¹⁴⁶ 〈清詩紀事（明遺民卷）〉，頁 179。

表一：明季崇禎末年蘇、松之災荒時疫(1638-1644)

時間	地點	旱災	蝗災	疾疫	饑荒
崇禎11年 (1638)	蘇州	自去冬少雨， 逮經春歷夏， 俱不雨。 (《啓禎記聞 錄》，2/3)	八月中旬，蝗蟲自江 北來，飛蔽天日，所 過雖不全傷，而罹其 害者不鮮矣。(《啓 禎記聞錄》，2/3) 秋，旱蝗從東北來， 沿湖依山，苗稼被 災。(崇禎《吳縣 志》11/51b)		
崇禎14年 (1641)	蘇州	自春及夏，雨 澤鮮少，河港 俱涸。(《啓 禎記聞錄》， 2/9) 五、六 月，亢旱無 雨。(崇禎 《吳縣志》 11/52b)	五月，蝗飛自西徂 東，經時不絕。 (《啓禎記聞錄》， 2/9) 秋初，蝗復生，禾稼 食盡，復生五色大 蟲，嚙菽類，亦無 存，米益貴。(崇禎 《吳縣志》11/52b)	五月，疫癘盛行， 有全家伏枕者，有 數口中死亡過半 者。(《啓禎記聞 錄》，2/9) 自四月至冬，比戶 疫痢，知縣牛若麟 市藥設局延醫診 視，療者什三，死 者什七。(崇禎 《吳縣志》11/52b)	
	松江	夏，亢旱。三 月至九月無 雨，江南大 旱，草木皆枯 死。(《歷年 記》卷上 /50。)	夏，蜚蝗蔽天，焦禾 殺稼。……捕蝗動以 數十百石計，蝗終不 能盡。(《閱世 編》，1/14) 我地大旱，飛蝗蔽 天，……佃戶葉某， 種稻田六畝，食之不 留寸草，惟見之墮淚 而已。(《乙酉筆 記》，頁7) 我地向來無蝗，其年 甚多，飛則蔽天，止 則盈野，所到之處無 物不光，亦大異事 也。(《歷年記》卷 上/50)		是歲大饑。(《閱 世編》，1/14) 夏，大旱蝗，米粟 涌貴，餓孳載道。 (康熙《松江府 志》51/13b)

明清之際江南時事劇的發展及其所反映的社會心態

崇禎15年 (1642)	蘇州			舊歲疫氣甚行，鄉城多死。今夏復多時疫，而鄉村尤甚，村落中互相纏染。（《啓禎記聞錄》，2/11）五月十四日，大疫。（崇禎《吳縣志》11/54a）	蘇城內外道路有食人之事。（《啓禎記聞錄》，2/11）民益艱食，流離竄徙，老稚拋棄道傍，城鄉房舍半空傾倒，死屍枕籍。（崇禎《吳縣志》11/53b）
	松江			延至初夏，……而疾疫大作，幾於比戶死亡相繼。（《閱世編》，1/15）	大荒，人死無數。（《乙酉筆記》，頁7）是年春，民死道路，填溝壑者無算。（《歷年記》卷上/51）
崇禎16年 (1643)	蘇州	過五月不雨，田不能蒔者，十居其一。米價日騰，民間迎神賽會者晝夜不絕，因以請雨爲名，至六月中得雨，人心始安。（《啓禎記聞錄》，3/5a）		十六、十七年冬春之交，疫癘又大行，且朝發夕斃，大抵城外尤盛。（《啓禎記聞錄》，3/6a）	
	松江	其年大旱，江底下尚掘深井打水。（《歷年記》卷上/54）			
崇禎17年 (1644)	蘇州	五、六月間郡中少雨，長晝炎威赫然，亢旱乃爾。（《啓禎記聞錄》，3/9b）			
	松江	六月，亢旱。直至冬至不雨，井汲俱竭。（《閱世編》，1/15）			

表二：明清初江南演戲價碼與物價比較

演劇的價碼（單位：銀兩/齣）		蘇州府米價（兩/石）		江南田地價格（兩/畝）	
萬曆年間(1573-1620)	1.08兩-3.4兩-	萬曆 12-16 年(1584-88)	0.25-0.35兩	萬曆初(蘇州府)	0.8兩
	5.6兩	萬曆 16 年-太倉元年(1588-1620)	1.2-1.8兩	萬曆 27-30 年(1609-1612)蘇州府常熟縣	1.1-2.5兩
崇禎 5 年(1632)	30-40兩	崇禎 10 年(1637)	1.1兩	崇禎中松江府	青浦、華亭 10+兩 上海 3-4兩
崇禎 14 年(1641)	10+兩	崇禎 14 年(1641)	3-4兩	崇禎 15 年(1642)蘇州府	4-5兩
順治 5 年(1649)	12兩	順治 4 年(1648)	3兩	順治初蘇州府嘉定縣	10+兩

資料來源：米價資料根據岸本美緒，〈清代前期江南の米價動向〉，《清代中國の物價と經濟變動》（東京：研文出版，1997），頁114-116；田價資料根據同氏著，〈清代江南の物價動向〉，同上書，頁154-157。